

目 錄

■ 專題論文 ■

- 晚清時期《東方雜誌》的中國文化論 范永聰 1
- 試論蔡元培學術思想的中西文化淵源 侯勵英 21

■ 研究述評 ■

- 歷史教學中文著作總目提要 周佳榮 30

■ 書刊評介 ■

- 《老師談教學：歷史教學篇》讀後 張 元 52
- 歷史學習參考書簡介 資料室 54

■ 學界動態 ■

- 香港學界歷史教育活動簡介 資料室 56
- 「廿一世紀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研討會紀要 資料室 58

* 本期封面照片：日本奈良法隆寺，區顯鋒先生提供，謹此致謝。

本刊內的論著，乃表示作者的個人觀點或研究發現，並不一定代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系方的意見。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record the personal views or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contribut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express the official views of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晚清時期《東方雜誌》的中國文化論

范永聰

一、引言

清朝末年不僅是近代中國內憂外患非常嚴峻的時期，也是傳統中國文化尋求轉化和迅速變遷的關鍵時刻。面對列強不斷侵略，不少知識分子開始懷疑傳統文化的弊端正是國家民族的致命傷。在此時期創刊的《東方雜誌》，作為一份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刊物，登載了大量討論中國文化發展趨向的文章，並試圖為傳統文化提供新的出路。本文擬從這些文獻資料入手，探討該誌在此關鍵時刻對中國文化發展的主要見解。

《東方雜誌》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創辦，從 1904 年 3 月創刊至 1948 年 12 月停刊為止，歷時四十四年，是中國近代史上壽命最長的大型綜合性學術雜誌。¹ 前後出版了四十四卷，共有五百多期，累計發表文稿二萬二千四百四十二篇，達一億多字。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出版界中，《東方雜誌》以其高度嚴肅性、學術性及豐富的內容，贏得社會推重，更被尊稱為「雜誌界的重鎮」、「雜誌的雜誌」，在廣大讀者心目中享有極崇高的聲望與地位。²

根據現存資料得知，《東方雜誌》在 1910 年代前後，每期的銷量約為 15,000 份，甚受讀者歡迎。³ 一份富有影響力的雜誌，必須擁有一個龐大的讀者群；若從該誌的銷量來看，可以肯定它是一份富有影響力的刊物。晚清時期的《東方雜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就是除了刊載讀者投稿、翻譯外稿及各類文獻資料外，還經常轉載當時中國各地報刊上的文章。當然，這些文章的觀點與立場是與《東方雜誌》較為接近的，足以反映該誌在若干問題上的看法。這種做法充分顯示了《東方雜誌》所表達的不只是該誌本

1 黃良吉《東方雜誌之刊行及其影響之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1；並參方漢奇〈《東方雜誌》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載方漢奇著《方漢奇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3 年），頁 278。

2 方漢奇〈《東方雜誌》的特色及其歷史地位〉，同註 1，頁 278。

3 Lo Shuk Ying, *Images of Japanese Imperialism in Eastern Miscellany, 1928–1937* (M. 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8), pp. 153–154.

身的意見，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內輿論界對某個問題的共同看法，從而提高了《東方雜誌》在近代中國報刊界的代表性。⁴

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觀感

在深入闡述清朝末年《東方雜誌》對中國文化的評論之前，我們有必要先了解該誌對傳統文化的整體評價。總的來說，該誌對我國悠久而輝煌的歷史與文化是給予高度評價的，第一期便刊載了一篇名為〈論中國責任之重〉的文章，強調「當太平洋南洋之衝者，非我東方之國乎？東方諸國我為大，其山河之雄厚，民物之殷蕃，又他人之所不及者也。」⁵ 該誌一些選錄的文章，亦指出中國不僅地大物博、文物殷蕃，而且歷史悠久，自古以來已是東亞地區的泱泱大國，「當五洲未交通以前，赫赫聲威，震懾大外。四境各小國，無不納貢品以來王。試披中國古史，中國之高尙尊貴，於東亞獨有特別聲價，而懍懍乎不可犯焉。」⁶ 又說：「中國者，世界發達最早，開闢最先之國也。有二萬萬方里之土地；有四萬萬秀淑之人民；有五千年傳來之歷史。……只以前此大地未通，環立四鄰者，皆劣等野蠻之國。」⁷

雖然近代中國苦於頻仍的內憂與外患，國勢已大不如前，甚至有被列強宰割瓜分的危機，但《東方雜誌》仍然堅持傳統中國的道德倫理是足以令中國重振的良方：

一言以蔽之，今日中國青年之大患，莫甚於借新道德之影響之皮毛，以破壞舊道德。無所制約，無所信仰，其影響及於社會，蕩無秩序。……吾今執保存舊道德之論，吾國之道德，為神洲特別之產物，西洋所未曾發明，而大適用於今日之實用者。⁸

傳統中國的禮法教化是悠久歷史下最優良的產物之一，就正如遠古中國的輝煌歷史一樣，「上有羲軒黃項之創造，中有堯舜湯文之擴充，下有伊周孔孟之法守」，歷史炳然，足以震耀宇宙。⁹ 何況傳統學術流派中，有不少對近代中國的危局有救弊起衰之用：

4 范永聰《東方雜誌與近代中國文化的變遷》（香港：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5年），頁12。

5 閑閑生〈論中國責任之重〉，《東方雜誌》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3月11日），「社說欄」，頁4。

6 〈外人輕侮中國多由中國自召說〉（原載六月十一日《大公報》），《東方雜誌》第八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10月4日），「社說欄」，頁161。

7 〈論中國人民之可用〉（原載乙巳四月二十六日《大公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七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8月25日），「社說欄」，頁138。

8 〈中國國學保存論之一〉（節錄自《政法學報》），《東方雜誌》第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5月10日），「教育欄」，頁49。

9 可權〈改良風俗論上〉，《東方雜誌》第七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9月4日），「社說欄」，頁133。

二百年前，我國有碩士，獨倡一學派，鎔孔、墨於一治。其學最切於今日救弊起衰之用。……其人為誰？顏、李二氏是也。顏、李生平以其學不媚於俗，既無時王與有權勢者為之推行，且其宗趣不重著書，而重實行。……夫吾所以汲汲表彰顏、李者，則以其學之宜於今日者。約有數端：一，有尚武精神，可以造軍國民也。二，有貞固道德，可以救時俗也。三，有實業教育，可以補生計也。¹⁰

清末不少知識分子認為傳統中國學術思想是中國走向腐敗、積弱的元兇，故欲挽救中國，必須大量輸入歐西文化的元素，使中國文化徹底改變。《東方雜誌》對這種想法極不認同，在一篇題為〈孟子學說為西學之祖說〉的文章中，作者荷介指出當時知識分子十分嚮往的眾多西方學說，其實有不少與中國古代先賢的學說不謀而合；這些西方學說的出現，或許正是受了中國傳統學說影響之故，所以傳統中國學術思想肯定有其可取之處。孟子（前 372 – 前 289）學說對西方學者的影響，更是顯而易見的。眾所周知，「先說義，後談利」可作為孟子學說的中心思想。孟子見梁惠王，力勸其治國之道在於「與民同樂」；又向齊王說仁義之道在於先利人，後利己。這種義利之辨與西方學者談論公益及公利的理念十分相像，故此，西方學者對於公益及公利的想法可能源於孟子的思想。¹¹

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之所以對西方文化推崇備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由於西方學說與「富國強兵」有著甚為密切的關係，故引入西洋文化，當可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原來孟子早已提出「富國強兵」的理想，荷介指出，不少中國知識分子以為孟子厭惡戰爭，稱妄自發動戰爭的人為「民賊」，即說明孟子對「富國強兵」的理念有一定抗拒，這其實是錯誤的。孟子認為君主的首要責任是令人民得到富足的生活，在國家受到外敵入侵、國民生命受到威脅時，君主必定要挺身而出，弔民伐罪，這便說明了孟子對國家富強的憧憬了。何況孟子所說的「民賊」，並非指有為及負責的君主；「民賊」是指那些殘民自肥、為滿足一己私欲而到處發動戰爭的人。這與古希臘著名哲學家柏拉圖（Plato，前 427 – 前 347）的想法是一致的。¹²

再者，孟子的「民貴君輕」思想更能顯示其學說與近世西方思想是十分吻合的。孟子說：「民為貴，君為輕，社稷次之」。在一個國家之中，人民是最重要的，君主的重要責任是為人民帶來安定富足的生活，君主是人民的公僕，人民絕非君主的資產。一個殘民自肥、荒淫無道的君主並非一位領袖，他只是一個「獨夫」，人民推翻其統治，甚至殺掉他亦無不可。這種思想與近代西方的民權思想可說不謀而合。¹³

10 蕕照〈論中國有救弊起衰之學派〉，《東方雜誌》第四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6月8日），「社說欄」，頁62–64。

11 荷介〈孟子學說為西學之祖說〉，《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七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8月14日），「社說欄」，頁145。

12 荷介〈孟子學說為西學之祖說〉，同註11，頁146。

13 荷介〈孟子學說為西學之祖說〉，同註11，頁147。

從以上的論述可見，《東方雜誌》對傳統中國文化的確是抱著支持的態度，並且經常批評一些持反對意見的人士。然而，我們絕對不能因此便斷言《東方雜誌》是一份盲目支持傳統中國文化的刊物，因為該誌對於中國文化中一些流弊，也曾用上不少篇幅作多方面且嚴厲的批評。

三、對傳統中國文化提出批評

清末時期的政治局面十分混亂，很多知識分子曾就中國政治前途發表過不少意見。《東方雜誌》作為當時學術界的潮流讀物，特別關注時局，對於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批評，著墨尤多。這主要集中於探討傳統中國君主專制政治文化的影響方面，例如在一篇題為〈論中國必革政治始能維新〉的文章中，便有以下一段文字，足以反映出該誌對傳統中國政治文化的意見：

夫所謂中西之政體截然不同者，何也？蓋西國之政體，以地方為百姓之公共產業，以百姓為一國之主人，而以君主及大小官吏為百姓之代表。是故於一國有利之事，百姓欲興之，政府不能不興也。於一國有害之事，百姓欲除之，政府不能不除也。……至於中國則反是。乃以皇帝為一國之主人，以地方為皇帝之產業，大小官吏為皇帝所役使之，而百姓特為產業上之所有物，等於奴隸犬馬。如是則一國之事，惟皇帝得主持之，惟官吏得與聞之，若百姓則惟有束手受治而已，何暇與聞國事？以此一大原因，乃結成二大惡果：其一，則官吏以為我乃皇帝所用之人，但使不得罪於皇帝，則雖剝削元氣，敗壞大局，皆與百姓無涉，非百姓所能責問。其二，則百姓非特不欲與聞國事，且並不知有國事。其於國家之利害安危，皆視為身外之事。極至國亡君死，亦漠不關心，率存一今日屬此，明日即屬彼之意。¹⁴

正正由於平民對國事的參與程度十分有限，導致中國人民培養出一種依賴政府的心態，逐漸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認為平民過分干預政事只會自找麻煩。¹⁵《東方雜誌》中的一些文章明確指出，由於中國人數千年來專以依賴及服從政府為事，導致我國人難以產生一種獨立自治的特性，在政府無能、國家衰弱之時，一旦遇到外來衝擊，便無能力抗拒，這正是清代末年屢屢受到列強欺凌而無力反抗的主要原因之一。¹⁶還有，由於中國的君主專制統治是一種極端人治的模式，故此中國難以產生出法治思想。¹⁷此外，中

14 〈論中國必革政治始能維新〉（原載癸卯十二月《中外日報》），《東方雜誌》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3月11日），「社說欄」，頁12-13。

15 〈論秘密之害〉（原載乙巳三月二十四日《中華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五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6月27日），「社說欄」，頁96；並參〈論中國人性質不宜對外之故〉（原載乙巳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報》），《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3月19日），「社說欄」，頁30。

16 楚青〈論政府不可自棄〉，《東方雜誌》第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5月10日），「社說欄」，頁41。

17 〈論中國社會之缺點〉（原載丁未七月十八日《津報》），《東方雜誌》第四年第八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10月2日），「社說欄」，頁154。

國人不止依賴性重，還因為久歷二千年專制統治而變得毫無權利思想，導致中國在近代競爭激烈的世局中常處於下風：

中國庶民，本無權利思想。數千年來，政治則專以壓之，教育則專以愚之。當其衣食纔足，聚族可安之時，蠢蠢然如鹿豕，蚩蚩然如牛馬。使之奉一君主，也可；使之奉數權貴，也可。朝也隸秦，則為秦之順民；夕也屬楚，則為楚之降虜。無有能去依賴之心，確然成地方自治之規模者。……吾聞治新學者之言曰：「競爭者，文明之代價也；權利者，義務之產兒也。」以吾中國舊歷史考之，一國之中，惟君獨尊，則無與競爭者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則獨享權利者矣。無與競爭，則文明不進；獨享權利，則義務已忘。不可謂非專制之極軌也。然以一人專制一國家，必有所不及之處。¹⁸

二千年君主專制政治文化還為中國歷代政府帶來上下蒙蔽的風氣，使朝政日益腐敗。在專制政體之下，官員最大的責任不是按本子辦事，而是盡其能力討好上級，並在出亂子的時候設法逃避責任；在中央政府做事的官員也是如此，只要想盡辦法討好皇帝便可以了。這便難免逐漸形成上下蒙蔽隱瞞的風氣，致使「內憂鬱積」及「外患憑陵」而出現近代中國衰弱之局。¹⁹

《東方雜誌》對中國傳統宗教文化亦作了一些批評，例如在一篇名為〈論中國人民依賴性之起原〉的文章中，明確指出傳統宗教信仰導致中國人習染極其迷信的風氣，迷信的風氣又使國人養成依賴的性格：

嗚呼！我中國之所以孱弱不振者，徒以人民有依賴之性質耳。有依賴即有憑藉，有憑藉即尚因循，而奴隸之性質遂一成而不可復變矣。雖然，人民依賴之性質不自今日始也。吾嘗即其故而推之，而知其皆出於神權思想。……古人之思想，以天、神、人、鬼皆有操縱人世之權，惟其有操縱人世之權，故民之有趨利之心者，即向鬼、神以祈福；有避害之心者，即向鬼、神以悔罪。由是而祭祀之禮興；由是而禱祈之典立。一若冥冥之中實操賞罰，而依賴鬼、神之思想遂為中國人迷信之本矣。²⁰

迷信的風氣深入民間，久而久之，更使我國人民由迷信神權而發展至迷信君權，不單止缺乏對專制政權的反抗思想，甚至對專制政府產生依賴，造成國民的依賴性格愈益嚴重。尤有甚者，不少知識分子在這種性格支配下變得越來越嚮往古時的世界，甚至認為現今一切均不及古代的良好，因而傾盡全力反對一切所謂「改革」，這便導致近代中國的改革

18 新華〈論中國無國權〉，《東方雜誌》第五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7月8日），「社說欄」，頁84-86。

19 〈論蒙蔽〉（原載五月初五日《中外日報》），《東方雜誌》第六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8月6日），「社說欄」，頁106-109。

20 〈論中國人民依賴性之起原〉（原載四月三十日《警鐘報》），《東方雜誌》第五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7月8日），「社說欄」，頁91-92。

運動波折重重，難以取得徹底成功。²¹

此外，迷信神權程度的深淺，與人民智識程度的高下也有甚為密切的關係。近代之世，歐、美諸國文明發達、科學昌明，不少迷信言論如天堂及地獄之說已被掃除殆盡。然而我國人還沉迷於神權迷信之中，諸如兩晉清談、六朝虛玄及晚明狂禪等餘風仍殘留在國人心中，導致我國實學不興，科技遠較泰西諸國落後，在列強猛烈入侵之下，國家覆亡之局已迫在眉睫。²² 何況，迷信神權之風必與祭祀、祈福等典禮有甚為密切的關係，而祭祀所用的金錢，數目尤鉅。在〈論疆臣之迷信神權〉一文中，便有以下一段文字記錄，從中可以估計當時廣東一省每年用於祭祀諸神的費用：

……且粵人之迷信神權，尤甲於他省，而銷耗亦最鉅，為患亦最烈。迎神賽會，幾於無一鄉而不舉行；無一歲而不舉行。費之鉅者，動逾鉅萬黃金。……若以之育才建學，創興工藝，其為益豈淺哉？以有用之財而銷於無用之地，可惜一也。每至秋高氣爽，則建醮以禳火星。夫免火之法，莫妙於多設機器水龍，倡行公共聯保火險。吾見向者公善堂，發起公共保險之議，倡之數年，各商人遲疑觀望，卒底無成。而禳火星之醮，則連年不絕。夫火乃藉淡養二氣而能焚，安得有一星以司之，而禳此星，即可免火哉？高蓋篷竹，遍燃燈火，適足以速火而已。愚不知變，可惜二也。以合省而計，不下千萬戶。一年中每戶媚神之費，扯計當不止一元。每年此千萬有用之金錢，或創公司；或設銀行；或為建築鐵路之資本，已足興全省無窮之大利矣。乃化為灰燼，付之東流，恬不為怪？可惜三也。²³

在窮鄉僻壤裡，一些鄉長更以神權時代的管理模式來管治鄉村。他們在有凶荒出現時，會命令村民籌集資金以鑄造神像，希望藉此求神庇佑，避過凶險；在有喜慶之事時，則會感謝神恩。甚或於一些關係到全村公眾的事務，也往往會與神佛拉上關係。例如在鄉民疑而不決時，他們會請神明代為決定；有人犯罪時，也會在神明面前處罰那犯罪的人。這一切都儼如神權時代的情況一般，足見中國人的迷信程度有多嚴重。²⁴

其實，中國迷信風氣盛行是與宗教教派過多有關。近世以來，西方科學主義興起，不少與宗教有關的迷信行為已被破除，泰西諸國也隨著科學主義的盛行而走向強大。可惜中國沒有這種機遇，自唐、宋兩代儒、釋、道三教合流以來，中國人在學術的帶領下，走上更為迷信的道路，這條道路至少為我國帶來兩方面的影響：其一，由於宗教繁雜而流派又多，人民花費很多精神於虛無的宗教思想，反而忽略了對學問的追求，是以我國宗教鼎盛，但學術思想的發展卻未見有空前的成就。其二，對神明的祈拜給予道德水準

21 〈論中國人民依賴性之起原〉，同註 20，頁 93。

22 〈論疆臣之迷信神權〉（原載九月初四日《嶺東日報》），《東方雜誌》第十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 年 12 月 31 日），「宗教欄」，頁 63-64。

23 〈論疆臣之迷信神權〉，同註 22，頁 64。

24 〈論革除迷信鬼神之法〉（原載乙巳三月初五日《中外日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四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年 5 月 28 日），「社說欄」，頁 89。

低落的人一個錯誤的信息，以為即使做錯了事，只要誠心向神明悔過，即可獲得寬恕；這便使國人肆無忌憚地從事不法的勾當，甚至祈求神明保佑他們，致使我國宗教越盛，道德卻反而越低落。²⁵

《東方雜誌》議論所及，甚至連二千年來執中國學術思想牛耳的儒家學說亦不輕易放過。該誌第一年第七期（1904年9月4日出版）轉載了《中外日報》一篇題為〈論中國宗教以賤武為宗旨〉的文章，提及儒家學派因有見自上古三代以來戰爭頻仍之事使「三軍暴骨」，乃主張天下一統，並以專制之策使一君一人統制全國，平民聽命於下，當可消弭一切戰爭。然而自孔學成為中國一尊之學說以來，中國面臨外患入寇之事可說無日無之；而內亂屢作，亦足證天下一統並不能完全消弭戰爭。反之，儒家學說倡議的弭兵之道，益使我國民成為柔弱民族，重文輕武。到了近代之世，天下各國均以兵立國，惟獨中國賤武之精神如故，卒落得外患頻仍而不能自保之局，這不可不說是孔學提倡弭兵主義的惡果。²⁶

作為二千多年來中國人的思想指標，儒家學說確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所在。〈論中國儒學之誤點〉一文的作者蛤笑認為，傳統儒家本來是一門對振興國民道德及國家發展有利的學術思想，然而後來的發展，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出現使其發生變質，過分重視道德倫理觀念方面的探討，而使其學說的內容愈趨空洞。缺乏專業、實用知識的支持是儒學的最大弊端，這種變化使儒家學說並不適用於事事講求競爭的二十世紀；深受其學說影響的中國，更因而飽受列強欺凌而無力反抗。²⁷是以蛤笑指出：「儒學家言，恆多謬點，其大為人心風俗之害，至於今而不可救藥者，則諱言利之說是已。」原因是：

古之聖賢，知人生之要於利己，乃天演之當然，而懼其操術之不當也。於是提出一「義」字，以為圖利之術。質言之，則義者，利之因；利者，義之果，必能和義而後為無害之利；必能得到而後非子子之義。義利者，一合而不可稍離者也。故凡真正利己之道，未有與道德相違反者。西儒惟深明此義。斯密亞丹及邊沁之書，尤能推闡詳盡。故其國群進步之勢，一日千里，遂以有今日之富強。吾國自孟子首斥言利，江都董氏繼之，義利既分，儒者之視功利如蛇蠍之不可手觸。持不衷之說，以生心害政，流毒於社會者遂數千年。由學術而釀成風俗；由風俗而積為政教。品四民者，以工商為末流；講經濟者，以富強為雜霸，斗筲負販之流皆知。……嗚呼！言謀國之道，而顧以富強為大戒，此真環球萬國未有之奇聞！

25 〈中國宗教流弊論〉（原載丙午十二月初五日《南方報》），《東方雜誌》第四年第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4月7日），「宗教欄」，頁1-4。

26 〈論中國宗教以賤武為宗旨〉（原載四月□□日《中外日報》），《東方雜誌》第七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9月4日），「宗教欄」，頁20。

27 蛤笑〈論中國儒學之誤點〉，《東方雜誌》第四年第六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8月3日），「社說欄」，頁101-102。

而吾國學者，乃奉而宗之如綱常名教之不可偶犯。然則求仁得仁，今日貧瘠衰弱之極，乃君相師儒數千年來所竭力講求以致之者。²⁸

誠然，儒家學說不追求利益的思想，在上古時代閉關自守、自給自足的中國國內可能不會造成很大問題，然而自西方歷經工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思想崛興，並隨著列強東侵而傳入門戶大開的中國，引起翻天覆地的巨變。中國在列強侵凌之下，必須勉力自保；但要在講求競爭實力的二十世紀中生存，國家的經濟實力可說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元素。在這種情況下，儒家學說中避談利益及重農抑商的弊端便成為中國一大致命傷。²⁹

傳統儒家學說既不重視利益觀念，自然也不重視「名望」了。人生在世，只短短數十寒暑，身故以後，留於世上的便只有「名」。當然，名望的大小及存在的長短與一個人在世時的功過有密切關係。人生在世時所能享受的一切，或多或少是由他的名望所給予的；今日我們擁有的文明，也可能是由於先民意欲「名留千古」而努力不懈地創造出來。這便足見名望對人類的重要性。古往今來，能使人在逆境中自強不息，克服萬般困難而達致成功，也多少是因為人類有求「名垂千古」的慾望。甚至先賢如孟子都說：「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可惜，自宋代理學勃興以後，儒家學說慢慢變成一套講求明哲保身的學術思想，導致我國知識分子重保身而戒冒險，輕視名望，中國開始走上一條停滯不前的道路。³⁰ 不過，必須一再指出的是，該文雖然對傳統儒家學說有所批評，但事實上依然維護各派傳統中國學術思想；是以文中強調，儒家學說在宋、明兩代逐漸發展成一套不切實際的學問，可說是傳統儒家學說和中國的最大悲劇。³¹

此外，在中國流播已久、甚有影響力的佛教，也曾受到《東方雜誌》的非議。在一篇名為〈論釋教之害〉的文章中，作者明確指出佛教的教義主張清靜寂滅，絕不積極，導致國家貧弱，印度之滅亡即為最有力的例證。何況佛教徒多出家修行，不重視生產，平白要國人供養；而寺院又坐擁大量土地，不納稅款，久而久之，僧侶與寺院即成為國家的一個沉重負擔。佛教在中國傳播多年，無疑是導致中國經濟疲憊及國家積弱的一個原因。³²

《東方雜誌》上的文章，還指出國家興亡的變數可在其社會、風俗及文化中看出端倪。若一個社會呈現太多腐敗與醜陋的風俗或現象，當可被視為一野蠻社會，在二十世

28 蛤笑〈論中國儒學之誤點〉，同註 27，頁 102-103。

29 蛤笑〈論中國儒學之誤點〉，同註 27，頁 103-104。

30 蛤笑〈論中國儒學之誤點〉，同註 27，頁 104-105。

31 蛤笑〈論中國儒學之誤點〉，同註 27，頁 105-106。

32 〈論釋教之害〉（原載甲辰十一月初一日《新聞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年 2 月 28 日），「宗教欄」，頁 1-2。

紀中隨時會被淘汰。³³ 中國社會無公德、實力觀念，也缺乏專業學問與思想。更糟糕的是，在二千餘年的專制政治文化統治下，中國人習染因循沿襲之風，一味守舊，故即使自十九世紀中葉起，西方思想如驚濤駭浪而來，我國人仍未能放開舊思想，盡情吸收西方的新知識與新事物。這正正就是清廷多次進行改革運動，但都不能得到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必須持有破釜沉舟的精神，徹底去除一切長久以來的壞習慣及不良風俗。³⁴ 纏足便是其中一例：

《舊金山報》云：「差拿輪船抵埠，有上海茶店陳新禮者，帶來纏足少女二名，往聖路易賽會，當侍茶之役。旅美華人聞此消息，即上書正監督倫貝子、副監督黃開甲，請其查明截止，免辱國體。」夫纏足為中國最野蠻之陋習，方奉 明詔勸誡革除，何物賤種，乃敢於萬邦矚目之會場，獻此醜態，可謂無恥極矣。³⁵

纏足不單是殘害女性的醜陋風俗，當中更反映了傳統重男輕女的思想與風氣。清末之世，各種西方思想在中國廣泛傳播，影響所及，不少婦女開始意識到女性絕對不是男性的附屬品，因而積極爭取女性權益。《東方雜誌》作為當時知識界一份重要的刊物，當然會對這個問題作出回應。在一篇名為〈論提倡女學之宗旨〉的文章中，作者呂蘭清認為，傳統中國的男性對女性施行「專制之權、愚弱之術」，只知把女性當作其「供玩之具」。然而男性與女性實有著唇齒相依的關係，男性一意愚弱女性，只會使家庭關係破裂。家為國之本，家無寧日，如何安國？³⁶

同時，勇立撰〈興女學議〉一文亦指出，女性不學無術，只作為男性的「供玩之具」，對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實有著許多不良影響，為害國家的整體生計。他說：

生利者眾而分利者寡則富，反是則貧，此生計學公理也。一國如是，一家亦然。故治家者，但使一家之中皆能執業自養而不仰食於人，則家道興矣。外國婦女，大率為學校教師，商店會計，以及工程測量，樂律收生諸事，即家事旁午，子女眾多，無暇兼任外事，而治家有法，教子有方，使男子者得專營室外之事，不至紛心而減生利之效，以計學分工之理言之，可謂生利而不可謂分利。我國婦女，拘於紡織針黹，獲利微細，不足自養；而教子治家之事，又因未嘗學問，毫無方法，則所謂室內生利事業者，吾未見其果有利也。夫不生利，則必分利，以

33 培卿〈論中國社會之現象及其振興之要旨〉，《東方雜誌》第十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1月30日），「社說欄」，頁279。

34 〈論現時社會之所謂進步〉（原載九月二十三日《時報》），《東方雜誌》第十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1月30日），「社說欄」，頁288-289。

35 《東方雜誌》記者〈賤種辱國〉，《東方雜誌》第五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7月8日），「時評欄」，頁19-20。

36 呂蘭清〈論提倡女學之宗旨〉，《東方雜誌》第五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7月8日），「教育欄」，頁109；並參〈論女學所以興國〉（原載乙巳八月二十五日《南方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十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12月21日），「教育欄」，頁255。

一男子所生之利，為一婦人所分，已不免於受累。而況其不止一人耶？³⁷

何況中國自古有言，人每每會多聽從身邊親人之勸言。大抵「五倫」之中，夫婦或為最親密的人際關係了。妻子的說話對丈夫一定有著很大影響。若妻子賢良淑德，自然能充當丈夫的賢內助，可使丈夫在工作上更能得心應手；但若然相反，妻子不學無術，且心腸歹毒，對丈夫的道德自然有所損害。³⁸ 故此，女性對一個社會的發展有著重大影響。

除了習俗問題外，國民質素差劣是另一個使人擔心的問題。中國號稱「禮義之邦」，道德教化向為異邦所稱道，豈料到了清末之時，國民的道德修養竟也受到質疑。「道德思想者，社會固結之原質，群治進化之機關也。自入世以來，道德問題即隨之而起。對於一家，有一家之道德；對於一群，有一群之道德。其群愈大，其道德之範圍愈廣。總之，以一身之道德為樞紐也。」³⁹ 可是我國自古以來，根本無所謂「公共道德」之觀念，不過隨學術思想的進化，而自成一種不錯的風俗而已。自甲午戰爭及庚子拳變以降，社會面目已告一新，國內有識之士紛紛透過著書、譯報等方法向國人介紹西方的新道德觀念，然而國人未能從中獲益；反而社會各階層中，盡露我國人欠缺道德操守的實況。在官場上，有所謂維新派官員藉著推行改革運動而以權謀私；肩負復興家國大任的留學生遠赴西洋，甫一到達，便即習染洋風，有的入籍外國，有的沉迷於紙醉金迷的洋式生活當中，忘卻自己的責任；國內坐擁大量資金的財主，只顧自己的享受，對於國家興亡的改革事業，大多無動於衷；平民百姓為了生活，有的淪為奸偽，有的成為洋奴，足見我國人的道德思想，早已煙消雲散。⁴⁰

泰西諸國的國民之所以能合力締造強大的國家，實由於他們擁有良好的公德觀念。可惜中國國民向無公德觀念，他們大多只求個人幸福，除此之外，便對身邊的事漠不關心。自私的性格使大多數中國國民不大關心自己的國家，在追求一己富足的同時，更往往不會顧存國家大局，這便造成西力東漸時我國苦無對抗之力。所以若不能使我國民擁有公德觀念，一切改革都絕對不能取得成功。⁴¹

37 勇立〈興女學議〉，《東方雜誌》第三年第十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2月7日），「社說欄」，頁242。

38 勇立〈興女學議〉，頁243；並參〈論文明先女子〉（原載丁未九月十七日《津報》），《東方雜誌》第四年第十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11月30日），「社說欄」，頁193。

39 〈哀同胞之將亡〉（節錄自十月初三日《警鐘報》），《東方雜誌》第十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1月30日），「社說欄」，頁295。

40 〈哀同胞之將亡〉，同註39，頁295-296。

41 〈論救中國必先培養國民之公德〉（節錄自丙午五月二十九日《羊城日報》），《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七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8月14日），「社說欄」，頁156-157；並參〈論國人失其自覺心之危上〉（原載丙午十月二十八日《時報》），《東方雜誌》第三年第十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2月7日），「社說欄」，頁254。

道德淪喪之餘，我國人又因缺乏尚武精神，更難於「黑鐵赤血」的二十世紀生存。我國遠古之時尚有尚武精神，軒轅黃帝大戰蚩尤即為一例。然而國家昇平日久，繁榮富庶的生活漸使我國人失卻此尚武精神。此外，還有兩個原因促使國人由強悍民族變為柔弱民族：其一，是科舉制度之推行。科舉考試以詞章為主，明、清兩代以來又奉行八股文取士的政策，使我國士人終日埋首於尋章摘句之中，全然不知世界戰事的真貌；讀從軍詩句，則思行軍甚苦，一旦想及戰爭又膽戰心驚，了無生氣。其二，是吸食鴉片的惡習。吸食鴉片的人全身毫無氣力，即使有尚武精神，也絕無尚武能力。⁴² 國民尚武與否與國家社會的興亡有著密切關係。英、法、德、美等泰西諸國強大，實因其國民有尚武精神之故；印度之亡，即因其國民欠缺尚武精神。中國國民若再不振興武力，勢必步印度後塵，在西力衝擊下走上衰亡之路。⁴³

與鴉片同樣毒害中國國民，並使民風日壞的還有賭博。中國的賭博文化由來已久，且為害亦甚深。在一篇名為〈禁賭私議〉的文章中，作者孫夢蘭以這樣的文字來形容中國的賭風：「今天下有一毒物焉，害人甚於虎豹，而無其爪牙；殺人利於戈矛，而無其鋒刃。非酒精之能發熱，而令人心醉；非女色之能悅目，而令人意淫。」⁴⁴ 賭博對中國民風所造成的壞影響，首推禍害國民生計：

生計學公理，一國之民皆生利者，則其國必富；反是則其國必貧。今試問賭之事生利乎？分利乎？吾知雖天下之至愚，亦知其屬於分利矣。吾國之好賭者，竟居全國民十分之五，則吾國四萬萬人，生利者不過二萬萬人而已。計學家公言，三四人之所贏，僅足以供一人之所耗。今生利者半，而分利者半，則此二萬萬人之所贏，必不足以供彼二萬萬人之所耗。而此二萬萬之生利者，亦終屬於不能生利而已。……故今日而不禁賭，則經濟政策終無施也。⁴⁵

賭徒若是嗜賭如命者，例必把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放在賭博之上，對身邊一切事情都自然不會上心。是以在一個國家中，好賭博的人數往往與知識分子的人數成一對比。這是因為好賭之徒絕無可能把時間放在鑽研學問之上，故好賭之人越多，知識分子自然越少。所以賭風盛行的國家，其文盲率遠較他國為高。再者，好賭者因沉迷賭博，自然把全部精神放於賭博之上，以致生活日夜顛倒，大大違反養生之道。中國賭風盛行，故國民身體大多欠佳，致使國民不能培養出尚武精神，遇上強頑的外敵時即無力抵抗。⁴⁶ 此外，賭博還會危害一個民族的道德發展：

42 〈哀同胞之將亡〉，同註 39，頁 297-298；並參〈論中國人性質不宜對外之故〉，頁 30。

43 〈論尚武主義〉（節錄自乙巳四月初三日《時敏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五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年 6 月 27 日），「社說欄」，頁 98。

44 孫夢蘭〈禁賭私議〉，《東方雜誌》第三年第十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 年 12 月 10 日），「社說欄」，頁 215。

45 孫夢蘭〈禁賭私議〉，同註 44，頁 216。

46 孫夢蘭〈禁賭私議〉，同註 44，頁 216-217。

一群之成立，必有道德以維持。道德盛則其群盛；道德衰則其群衰，此一定之理，無可逃於天地者也。好賭之人，無所謂道德也。其所知者，私利耳。……品格卑下，志氣昏惰，性情貪鄙，數者實兼有之；又其甚者，乃以好賭之故，而父子失其愛；兄弟失其和；夫婦失其睦；朋友失其誼；伯叔甥舅失其禮，是天下壞倫常、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於賭者也。⁴⁷

眾所周知，中國工業不夠發達，當為遠遠落後於西方諸國的一大原因。但原來我國工業不振，竟與國民質素差劣的實況有極其密切的關係。《東方雜誌》選錄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國向來有一種「秘傳文化」，對工商業發展造成很大傷害。自古以來，凡創造出新器物的人皆害怕器物的製造方法被他人習得，以致本來可獨享的厚利被人瓜分。所以歷來有識之士均以「不傳之秘」為藉口，絕不會把一身所有知識傳授給學生，因而令工業技術及學識水平出現一代不如一代的情況。這種文化不僅把中國人自私自利的本性表露無遺，更窒礙中國工商業的發展，使我國的工業技術遠遠落後於西方之後。⁴⁸

除了以上數端，國人還有一個足以導致亡國滅族的致命傷，即為不能合群，並嚴重缺乏團結精神。《東方雜誌》上有多篇文章一致強調，中國志士奔走十餘年，為國家改革的大業努力，但多次失敗，最大的原因就是國人未能團結合群，更往往由於一己私利，致使改革在得到成效之前，人事的內鬥已奪取了改革的成果。⁴⁹〈論中國不能合群之原因〉一文指出，中國人始終未能達到團結合群的原因有四：其一，由於傳統以來專制政治文化的影響，官吏高高在上，平民百姓在社會上並無任何地位，遇到困難都不能向統治階層求助，久而久之，遂產生官民嚴重分隔的情況。其二，中國人過份著重地方觀念，除了「中國人」這一個統一稱號外，還十分在意籍貫，導致同一籍貫的人容易走在一起，形成族群，並不時會排斥族群以外的人。其三，中國為一多民族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容易產生種族糾紛，導致難以合群。何況在清代統治中國之時，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統治者並非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漢族，反而是身為少數民族之一的滿族，這就更易造成滿、漢兩族之間更多的矛盾；加上清末之世，革命黨屢次發起意欲推翻清朝統治的起義運動，而漢人又是革命運動的主力及中堅分子，這就使漢、滿兩族之間更難和平共處，遑論要兩族人團結合群了。其四，中國學界有維新派與保守派之爭，不同學者對中國的發展路向各抱不同的意見，門戶分立，壁壘分明，自然難以統合團結。⁵⁰ 上述四點互相影響，卒造成中國人種種不能合群的「怪狀」。故此，若要官民一家，打破隔膜，

47 孫夢蘭〈禁賭私議〉，同註 44，頁 217-218。

48 〈論秘密之害〉，同註 15，頁 96-97。

49 〈論中國不能合群之原因〉（原載甲辰十月十五日《羊城日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年 2 月 28 日），「社說欄」，頁 20；並參〈論救中國必先培養國民之公德〉，頁 157；〈論國人失其自覺心之危下〉（原載丙午十月二十九日《時報》），《東方雜誌》第三年第十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 年 2 月 7 日），「社說欄」，頁 257-258。

50 〈論中國不能合群之原因〉，同註 49，頁 20-24。

必須立憲法、開國會，使平民百姓也有議政的權力，與此同時，政府亦應限制官吏權力，如是當可增加兩個階層的接觸，進而減少彼此的矛盾；若要打破國人的地域觀念，必須併行省；要使滿、漢兩族和平共處，甚至團結合群，必須使兩族人共享同一權利，兩族人不分階級高下；最後，若要學界團結，平息糾紛，必須使各學派明瞭其於教育發展方面均有個別而不能取代的重要性。如是者則國民合群，團結一致，中國始有抵抗外敵的能力。⁵¹

要之，近代以來，中國人的道德水準每況愈下，已到了危及國家生存的地步。故此道德改造對中國人來說，已是刻不容緩的事。要達到這個目的，教育的重要性至為明顯。自秦、漢兩代以來凡二千餘年，科舉制度愈趨成熟，可說是中國悠久以來選拔人才的唯一方法。科舉制度的流弊在近代逐漸呈現，廢除之議屢出。《東方雜誌》第十一期（1904年12月31日出版）收錄《警鐘報》上的文章，題為〈論中國人才之自然退化〉，文中明確指出傳統中國科舉制度的流弊，可謂一語中的：

嗚呼！環視東、西各國，其人才之盛，莫不蓬蓬勃勃，日趨於進化之機。而內顧中國，人才消乏，已呈一自然退化之現象。夫吾中國之所謂人才者，吾知之矣。在所聞世，所傳聞世，皆沈溺於攷據、詞章、八股之中，以升官發財為希望；以田園產業為目的，殆不知人世間有所謂社會、國家事也。⁵²

《東方雜誌》選登的另一篇文章〈論中國士人腐敗之原因〉，進而指出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科舉制度支配下，可說是「學非所學」，只能說他們是附屬於朝廷的一個特殊階層，甚至可以說是「國民之一大蝥賊也」。⁵³ 中國士人如斯腐敗的原因，主要與他們所學習的知識有關：

……挾其攷據、詞章、時藝無用之學問，歆其舉人、進士、翰林不貲之科名。無普通之學業，無特別之思想，不知亞細亞、歐羅之何在；不識唐宗、漢祖之何屬；不審專制、共和之何政；不曉憲法、公法之何物。於世界之大勢、國家之學理、國民之公義、豪傑之責任，懵乎未有知也。其經營斗室之中，咕嚕衡廬之內，舍作官發財之餘，別無思想；田宅妻子之外，絕少抱藏。是讀書者實以養成貪慾不道之品格也。⁵⁴

基於這個原因，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欠缺實學，他們透過科舉成功而進身統治階層，之後便開始過著頹廢的官場生活。他們競逐官階、俸祿，以得到天子恩寵及個人富貴而沾沾自喜，卻不知自己真正的責任所在。偶爾也有些士人明白自己肩負有傳播學術知識的

51 〈論中國不能合群之原因〉，同註 49，頁 24。

52 〈論中國人才之自然退化〉（原載八月二十三日《警鐘報》），《東方雜誌》第十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12月31日），「社說欄」，頁 266-267。

53 〈論中國士人腐敗之原因〉（節錄自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警鐘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2月28日），「教育欄」，頁 5-6。

54 〈論中國士人腐敗之原因〉，同註 53，頁 6。

責任，但他們所學的均為應付科舉考試的空洞知識，根本無實學之用。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國數百年來都不能產生像孟德斯鳩（Charles Louis Montesquieu, 1689 – 1755）、盧梭、克杜威爾和佛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 1706 – 1790）般偉大的西方學者；更沒有出現過與公理、民權、自由政體、國會、代議政制及共和民治有關的理論。凡此都說明了在科舉制度的支配下，我國知識分子和學術界的腐敗實況。⁵⁵

綜觀《東方雜誌》對傳統中國教育及科舉制度的批評，可說切中要害。中國傳統教育嚴重缺乏自然科學，明、清兩代以八股文取士，使知識分子的思想受到嚴密的控制，均為傳統中國教育不濟的主要原因。《東方雜誌》能指出這些弊端，足以證明它是一份富有極強觀察力及分析力的刊物。至於民間的一般普及教育，成績也乏善可陳。鄉間雖然有興辦鄉學之舉，但大多只是以《三字經》和《千字文》等識字用書為教材，只能用作鄉間兒童學習識字之用，終究無助於教授各類實用知識或理論。⁵⁶

上文已經指出，中國學術思想中也有足以為救濟時勢的學說，但當中仍有些元素或論點的確是不合時宜的，例如大同說和平等說便清楚不過了。儒家與墨家兩派學說均有談及大同及平等之義，孔子（前 551 – 前 479）說「仁」、「義」，旨在令天下為公，講信修睦；墨子（前 468 – 前 376）論兼愛，勸人視人國如己國，推己及人。然於二十世紀之時，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競爭愈益激烈，徒說信用及視人國如己國等論調，已不再在國際間存在。若我國人再墨守成規，只是阻礙國家進化而已。故此，傳統學說中也許還有一些論點是不適合於現世的，只有使其去除一途，方可使我國學術推陳出新。⁵⁷

中國學術思想中的個別流派除了展現不合時宜的弊端外，還要負上導致國民「民氣」衰弱的責任。⁵⁸ 傳統儒家學說要求知識分子必須具備「謙讓」的性格，致使我國人才大多自謙，令政府難以在民間發掘到真正於國有用的人才；老子的道家清靜無為之說使中國部分知識分子甘於自暴自棄，隱遁山林之中，亦使政府無才可用；至於一般百姓，則以清靜無為做藉口，大多好逸惡勞，足見老子學說對中國民氣誠有大害。宋代以降，理學興起，諸儒均以主靜之說為學術之主流，加上宋朝政府重文輕武的國策，卒造成國民遠離勇武精神，習染風流怯懦之風；更有甚者是從主靜說轉化為保守主義，反對一切主動的改革，使民氣下挫，國家積弱不振。⁵⁹

55 〈論中國士人腐敗之原因〉，同註 53，頁 6–7。

56 培卿〈論中國社會之現象及其振興之要旨〉，同註 33，頁 279–280。

57 〈論大同平等之說不適用於今日之中國〉（節錄自九月二十九日《警鐘報》），《東方雜誌》第十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年 1 月 30 日），「社說欄」，頁 301–302。

58 申蘇〈論中國民氣衰弱之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八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 年 9 月 23 日），「社說欄」，頁 154。

59 申蘇〈論中國民氣衰弱之由〉，同註 58，頁 154–155。

四、提出改革傳統中國文化的方針

《東方雜誌》既然對以上所述的傳統中國文化元素作出批評，當然也會為廣大讀者提供多項改革方案；但在實行改革之先，必須注意按照既定的方向行事。總的來說，《東方雜誌》反對徹底模仿西方的改革路線，並堅持傳統中國文化仍有甚為可取之處，強調「夫可變而變，可守而守，應機制宜，徇公舍私，轉亡為興，化禍為福。」⁶⁰ 換言之，傳統中國文化中必須改正的地方就必須修改，但值得留守的也絕對不能輕言放棄，此即所謂「徒有正氣⁶¹而無新知識，終矣無功。」⁶²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傳統大國，傳統文化在輝煌歷史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中國以往強大或多或少是由於其傳統文化之故。沒有一個國家能完全放棄自己的固有文化，而把別的文化全盤移植到自己國家之內。故此任何變法或改革運動都必須以歷史為根本，檢討本身文化的弊端，明白自己的需要，進而向外來文化學習，取長補短，當為自強成功之道。⁶³

即使是足為近代中國效法對象的泰西諸國，對其歷史及傳統也是抱著十分尊敬及引以為傲的態度。西方國家大多擁有自己的歷史博物館，並會把與國家歷史發展有關的古蹟及文物公開，讓別人多加了解自己國家充滿光輝的歷史。這便足證西方人對自己國家的歷史是何等自傲的了。⁶⁴ 何況每個國家或民族都有其本身的特質，如英、美兩國之活潑，德國人之精嚴及講求紀律，法國人之奮勇、浪漫等。⁶⁵ 這些特質的形成，與該民族聚居地的地理形勢及其民族的發展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各個民族所居住的地方，由於地理形勢各異，故不同民族之間的風俗與特質往往大相逕庭。基於這個原因，一個民族的風尚可能是歷經千多年而產生出來的，若要她勉強丟棄自己由來已久的民族性格，改而全盤接受另一個民族的性格，恐怕是不大可能的事。⁶⁶ 中華民族最早居於華北平原及黃河流域一帶，西北有連綿不絕的大山；東南則有大海，本是一利於封閉的國度。華北

60 [日本] 長尾雨山〈對客問第三〉，《東方雜誌》第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年5月10日），「社說欄」，頁45。

61 此處所謂「正氣」，實指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之主流——儒家思想。儒家學說支配中國人的思想凡二千餘年，雖然有其弊端，但作為我國人之普遍倫理準則，絕對不能輕言放棄，只要略作修正，使其適用於當世即可。詳見〈中國國學保存論之一〉，同註8，頁49-51。

62 〈中國國學保存論之一〉，同註8，頁51。

63 別士〈論變法必以歷史為根本〉，《東方雜誌》第二年第八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9月23日），「社說欄」，頁153-154；並參〈論近日人心宜重古道〉（原載丙午正月二十日《中外日報》），《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3月19日），「社說欄」，頁37-38。

64 〈論尊古之心理〉（原載丙午十月二十六日《南方報》），《東方雜誌》第三年第十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2月7日），「社說欄」，頁251。

65 〈論尊古之心理〉，同註64，頁253。

66 〈風俗篇〉（原載丁未年二月二十一日《申報》），《東方雜誌》第四年第三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5月7日），「社說欄」，頁49。

土地肥沃，物產豐富，使國民得以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逐漸形成閉關自守的意識形態，並拒絕與外人溝通交流，甚至自視為天朝大國，把四周其他民族視為不文明的蠻夷。這種思想使中國人慢慢變成一個保守的民族，並拒絕接受外來的文化。⁶⁷ 由此觀之，中國人的保守和愛好和平乃先民所造成的性格，其民族性或有所缺失，卻不可輕言放棄。始終一個民族有其特性，一個國家亦有其傳統，若硬把西方文化的全部元素強加於中國身上，並完全放棄中國之傳統，則可能如「庖丁解牛」一般，得不償失。⁶⁸

按照這個改革大方向，若要改變中國傳統風俗，必須先注意各項風俗孰優孰劣，以求去蕪存菁：「改良風俗之方針，在於斟酌世界之公理，吸收各國之文明，不容有一毫怙恃祖國之心，亦不容有一毫厭薄祖國之心。然何者為良，何者不良；何者當改，何者勿改，不難縷析條分，一一見諸實事矣。」⁶⁹ 要做到中肯、客觀地評鑑傳統中國文化的優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為此，《東方雜誌》選錄的〈論中立學派〉，強調知識分子須具備中立的思想，並力求於「新」、「舊」之間取得平衡：

以我國學界雖屬幼稚，然中立之期望，則必有償，則其界說不可不正。今縱未能具中立之全體，而於新、舊二端，苟有所見正，不妨去短取長，而無為二學之奴隸，則得之矣。且夫不能中立，即不能為新，不能為舊。以其說皆阻礙治安，而不可行。故中立者，天演進化必至之階級也。今日新、舊互攻，勢成冰炭。守舊之政黨，吾無責焉；所號維新志士者，又或持之過激。守之太偏，於舊黨之肯言新者，尚必故意攻擊，靳以新學之名，此所謂既入其筌，又從而招，甚無謂也。……然則中立者，實當今之對病藥石也。以舊學為保存之國粹；以新學為輸入之文明，此於中立之義，雖未能盡，亦庶乎其可也。⁷⁰

《東方雜誌》之所以堅決反對徹底模仿西方的改革路線，主要是由於該誌考慮到徹底模仿其他國家的文明，反而可能會對自己的國家造成一些傷害，例如對清末中國來說，勉強模仿西洋文明以作為中國文化的出路，在未見到中國文化成功轉變之前，就肯定出現以下的經濟弊病：「以半開化之民，而欲模倣文明人之使用，則其弊必致影響於一國之經濟界；影響於一社會之道德界；影響於一身、一家之經濟界與道德界。何言乎影響於一國之經濟界也？吾國凡百工廠皆未興，而外洋凡百品物，皆適於用。以不興工藝之國，而遇最適用之物，則我國人之樂於購用者，天演之勢也。雖然是有界限焉，不可以不辨。吾國近年統計出入口貨，常立於負差之地位。」其原因有三：

一由於花、紗、煤、油等之銷路愈推愈廣也；二由於外人模倣我國所固有之物，而適於常用者，以餌我也；三由於我國民之從事於邑業者，耳觸目接，喜用

67 〈風俗篇〉，同註 66，頁 49-50。

68 〈論尊古之心理〉，同註 64，頁 253-254。

69 可權〈改良風俗論上〉，同註 9，頁 136-137。

70 〈論中立學派〉（原載六月二十日《羊城報》），《東方雜誌》第八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4 年 10 月 4 日），「社說欄」，頁 169。

洋物也。夫由前二端言之，若同一物也，彼物質佳而我劣；彼物價賤而我貴，則其用之也，亦宜。若後一端，則本非我社會所常用，而為可有可無之物。今不之察，必欲盡物而模倣之，以為適時；甚則盡人而模倣之，以為諧俗。其漏卮又安有既乎，此可慮者一。⁷¹

何況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其進退往往與人民節儉風氣的盛衰有密切關係。人民生活節儉，道德水準較易維持；但若人民的生活愈益奢侈，則其道德水準也自然愈趨下降。在西方世界，生活在大城市內的人大都生活奢華，故其道德水準亦相對較低；中國大部分地方為農村，國民過著簡樸而節儉的生活，但其道德水準卻可能較高。故《東方雜誌》十分擔心若我國以徹底模仿西洋文化的方法來建立一套全新的中國文化，勢必會把西方的工業文明及奢侈風氣帶入中國，並使我國人之道德愈益退化。⁷²

但如何才能把西方文化的優點引入中國傳統文化之內，並移除中國文化的缺點，以造就一個全新的中國文化呢？這是一個十分難以解答的問題，而要造就一個文明的、全新的而又適合二十世紀新時代的中國文化，絕對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過，至少在決定西方文化中那些優點適合中國之前，不妨先對東、西兩大文化體系作一簡單而根本的比較：⁷³

大抵中國地面為世界無雙之大陸，當漢族入居之始，雖有苗、黎蟠據，不甚蕃衍，誠可謂地廣人稀。又有江河灌輸之便，故漢族之民，即由游牧時代而轉入耕稼時代。其求衣食之途，惟在農桑，遂以重農貴粟為國之本務，且欲使天下同出耕稼一途，以粟多為國富，乃至輕商賈，禁末作文巧，而井田、宗法於斯以立，遂為制治之淵，數歷數千年，雖有更革，然其大要終不遠其初，亦越於今，猶未出乎宗法社會。西方地勢多山陵，而無中國沃野之原。故其民之求衣食者，重在商貨，故貴技巧，崇末作。且本洲之物產不足以供生事，故復重航海，覓地而以擴張國勢為務。如是，則其民紛雜走散，非若農業者之較若畫一，故貴自治，非此不能保衣食。其政府壓力之施於民者，民之自治力足以相制，故民遂獲政權。⁷⁴

上文大致上說明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異的原因。作為一個重農抑商的農業國家，社會安定是農業發展的基本元素，故此中國歷代統治者皆以專制君主的統治模式來治理國民，以求社會穩定和農產業豐收。西方因缺乏農地及資源，乃較著重商業的發展，反而逐漸形成自治的規模。近世西力東漸，中國無力抵抗的事實足以證明，傳統中國文化中的若干弊端如君主專制政治和過份重農抑商等措施，使中國遠較西方落後，是以把西方

71 〈論模倣文明之弊〉（原載甲辰十一月二十五日《時報》），《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2月28日），「社說欄」，頁26-27。

72 〈論模倣文明之弊〉，同註71，頁27-28；並參〈論以奢侈模倣文明之弊害〉（原載丁未十月初五日《神州日報》），《東方雜誌》第四年第十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11月30日），「社說欄」，頁194-195。

73 蕕照〈論制治之原〉，《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七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8月25日），「社說欄」，頁131-132。

74 蕕照〈論制治之原〉，同註73，頁132-133。

文化的優點引入傳統中國文化之中，便成為傳統中國文化的重要出路之一。⁷⁵

誠然，《東方雜誌》對西方文明是肯定的。西方文化的元素為泰西諸國帶來富強，是不爭的事實，但對於清末一些知識分子主張以全盤否定傳統中國文化的方法來重整中國文化，該誌是絕對不同意的。在一篇輯錄自《國粹學報》、題為〈論國粹無阻於歐化〉的文章中，著者強調為中國文化注入西方文化的若干元素，的確可以使中國文化產生變化，並且更形壯大，但國粹作為一國之本，卻絕不可棄：「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之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是故國粹存則其國存；國粹亡則其國亡。此非余一人之私言也。」⁷⁶ 即如近代的文明強國，在其尋求富國強兵的道路上，也絕不會放棄本國的國粹，例如：意大利立國，即因其民族有著古羅馬莊嚴強大的歷史傳統為其集體文化記憶，因而成功統一，並躋身當世強國之列；日本在維新運動中，雖已一變其傳統文化，大量輸入歐西文明，但日本人對其傳統大和魂的尚武精神及神道思想，依然是十分尊敬的。⁷⁷ 何況，眾所周知，日本的維新運動又名「王政復古」，足證日本人對於其歷史傳統的重視了。⁷⁸ 由此足見，保存國粹對引入外來文明的若干元素並不會造成任何重大阻礙。

再者，西方學者多謂近代歐洲文明的出現乃承接中古後期文藝復興的影響。文藝復興是西方進入近世文明的重要里程碑，隨著傳統西方文化的復興，歐洲諸國終於踏上富強之路。⁷⁹ 這便足證國粹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性了。近代中國文化的出路該以傳統中國文化為其「精神」，並注入西方文化的若干元素為其「形質」，二者相輔相成，當可使中國文化走向強大。此即正如我國古書《論語》所言：「溫故而知新」，正是國家以至國民追求富強的正確方向。⁸⁰

不過有一點必須強調，《東方雜誌》雖然反對盲目地把西方文化的所有元素加到中國身上，但又同時認為，任何改革都必須有一定深度方能成功。例如清代中葉的多次改革運動均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即為深度不足所致。單單學習西方的先進器物是絕對不足夠的，深入文化層面的探討及學習方能使中國走向富強。當然，這種學習並非全盤的移植，而是把西方文化的優點學習過來，並使之與我國傳統文化的優點相結合，成為新的中國文化。要之，只要確立一個正確的改革方向，便應盡量觸及其最深處，開展一場富

75 蕤照〈論治政之原〉，同註 73，頁 133-134。

76 〈論國粹無阻於歐化〉（節錄自《國粹學報》），《東方雜誌》第三年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6年2月18日），「社說欄」，頁 8。

77 〈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同註 76，頁 9。

78 〈論近日人心宜重古道〉，同註 63，頁 39。

79 〈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同註 76，頁 10。

80 〈論國粹無阻於歐化〉，同註 76，頁 12-13。

有深度的改革運動，中國才有希望。⁸¹

設定了改革方向後，還必須為推行各項改革的方法籌謀。事實上，甲午戰爭之後，中國尋求改革的綱目主要集中在兩方面，即政治與風俗；兩者的改革必須同時並行，相輔相成，方能使中國走向富強。然而，中國的專制政治文化積習太久，人民的迷信風氣亦太盛行，形成一牢不可破的環境，使一切改革難以收效。故此推行改革的策略，對改革的成敗起了關鍵作用。歷來推行改革的策略不外兩種：「一曰自上，一曰自下」。自上即以政府為推動改革的主動力；自下則相反，以人民為推動改革的主動力。當然，無論改革的主動力來自政府或人民，只要改革的方向及政策得宜，亦可收到一定功效。不過，面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國情，則必須仔細思考，究竟應由政府還是人民來帶領整場改革運動。⁸²

考慮到當時中國的國情，〈論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難易〉一文的作者孟晉認為應以政府為推行改革的主動力，並帶領整場改革運動。他更力勸清政府宜效法日本明治維新的故事，立即下詔訂立帝國憲法，明令全國人民投入推行改革。以政府為推行改革的主導者，其原因有三：第一，傳統中國人民有強烈的服從性，故由政府親自推行一切有關改革的各項措施，當較易為人民所接受；第二，我國民智未開，普遍人民的知識水平還是甚低，要求由民間力量帶領整場改革運動，似頗艱難；第三，由民間主導改革，或能收潛移默化之功效，使改革風俗的效益更為顯著，但這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正當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恐怕沒有太多時間來進行這些潛移默化式的教化運動，故此以政府的力量來帶動一個推行得快速一些的改革運動，似乎更切合當時中國需要。⁸³

還有一個關於改革的觀念，是必須加以澄清的。《東方雜誌》內的論著認為，自清代中葉開始，無論是洋務運動還是戊戌維新，其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由中央政府計劃、統籌及付諸實行，可惜這些改革運動最後都以失敗告終。這雖然不足以完全說明清廷無力充當改革運動的領導者，但或多或少道出了朝廷於改革事業未盡全力、或改革不得其法的真相。故此，由政府領導改革雖然較為適合中國當時的情況，但改革必須是全盤性的，觸及文化及精神層面的，而且絕對不是純粹吸收西方器物形式的表面改革。只有接觸層面廣泛的改革運動，才可使中國走出惡運。⁸⁴

81 蛤笑〈論變法之當從事根本〉，《東方雜誌》第四年第十二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8年1月28日），「社說欄」，頁216-217。

82 孟晉〈論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難易〉，《東方雜誌》第二年第一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5年2月28日），「社說欄」，頁1-2。

83 孟晉〈論改良政俗自上自下之難易〉，同註82，頁3-5。

84 〈論中國欲自強宜先消融各種界限〉（原載丁未三月二十日《京報》），《東方雜誌》第四年第五期（上海：商務印書館，1907年7月5日），「社說欄」，頁83。

五、結 語

由此可見，晚清時期的《東方雜誌》已對傳統中國文化進行了一次有系統的研究，除指出其弊端外，還為傳統文化的改革大業努力籌謀。儘管所提出的見解未能得到當時中國知識分子的一致認同，但不能否認的是，該誌的意見仍是十分寶貴的，並充分反映了晚清時期部分知識分子對傳統中國文化復興的憧憬與寄望。這種意見在近代中國文化發展與變遷的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

此外，尤應注意的是，《東方雜誌》在此時期已明確表達了它的「文化調和論」。該誌認為中國文化雖然與西方文化大相徑庭，但兩種文化沒有文明程度上的差異，甚至西方文化之長正好濟中國文化之短；傳統中國文化的出路，也許就是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調和與結合。這個主張在近代中國發展史上有重大的意義，該誌本身也能貫徹始終，在漫長的出版歲月中，堅持為這個理想而奮鬥。

【作者簡介】范永聰，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

試論蔡元培學術思想的中西文化淵源

侯勵英

一、引言

蔡元培（1868–1940 年），浙江紹興人，字鶴卿，號子民，是近代中國從舊學走向新學的知識份子，並且成為領導潮流的著名教育家和思想家。綜觀蔡元培的生平，他以翰林的身份，在晚清時期投身革命運動和新教育事業，曾經出洋留學察，注意新知，其學問糅合了中西文化學術的精髓；民國時期擔任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大學院院長及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對教育和學術貢獻良多。

蔡元培著述等身，計有《學堂教科論》（1901 年）、《中國倫理學史》（1910 年）、《中學修身教科書》（1915 年）、《哲學大綱》（1915 年）、《簡易哲學綱要》（1924 年），譯書有《妖怪學講義》（1906 年）、《哲學要領》（1924 年）、《倫理學原理》（1934 年）等，編為《蔡元培全集》。¹ 可見蔡元培不僅於近代中國教育有實際事功，在學術鑽研方面亦有相當重要的成果，其學術思想的淵源，大致可以從四方面加以探討：第一，是家庭環境的薰陶；第二，是傳統教育的影響；第三，是研習西學的領悟；第四，是出外留學的經驗。扼要而言，前兩者屬於中國因素，後兩者屬於西方因素，從而造就了他融會中西學術的條件。以下試就此數端作出具體說明。

二、家庭環境的薰陶

蔡元培的故鄉紹興是「人文薈萃、國學隆盛」的地方，歷代出了不少著名的文學家、美術家，例如東漢有思想家王充（27–約 97 年），東晉有書法家王羲之（321–379 年）、唐代有文學家賀知章（659–744 年），南宋有愛國詩人陸游（1125–1210 年），明代有書畫家徐渭（1521–1593 年），清代有史學家章學誠（1738–1801 年），近代有舊文學的殿軍李慈銘（1829–1894 年）和新文學的開山魯迅（原名周樹人，1881–1936 年）等等。連蔡元培

1 有關蔡元培著譯書籍的情形，可參周佳榮〈蔡元培著譯書籍解題〉，《當代史學》第 4 卷第 3 期（2001 年 9 月），頁 49–52。

出生地筆飛弄的地名源流，亦有一番神話傳說。² 蔡氏自年幼時已從長輩口中聽到不少關於家鄉特有文化遺跡以至歷代文人學者的故事，加上清代的紹興深受氣節及理學的影響，讀書人「述宋儒的緒餘，把『知』和『行』打成一片」³，在潛移默化的情況下，對蔡氏日後重視道德氣節以至從事文教事業的發展均有深刻影響。

蔡元培的祖父是典當舖經理，父親為錢莊經理，叔父六人多任職於錢莊，除了三叔習武外出，其餘各人皆住在一所兩進式的房子，設有花園和天井，環境不俗。⁴ 由是得知蔡元培幼年生活於小康之家，大概可以安心學習。但他的祖父和父親相繼去世後，礙於家中積蓄不多，加上幾位叔父又面對失業問題，家道逐漸衰落，其母惟有典當首飾，節省開支，勉強支持蔡元培讀書的費用。⁵ 蔡元培自少經歷了家庭環境的變化，其感受必定非常深刻，從而激勵他要發奮圖強，爭取並珍惜學習的機會。

在蔡元培成長的過程中，其家人所擔當的角色亦不應忽略。首先是祖父的影響。其祖父蔡廷楨（1809–1872 年），字佳木，從事典當事業，為人節儉非常，故能置田產、造房屋，為子孫後代建立了小康的家庭環境。他是一個勤學的人，據傳他於夏夜讀書時，因為沒法拒趕蚊叮蟲，惟有置兩脛於缸中，免受滋擾。⁶ 他去世時蔡元培只有六歲，但這種勤奮苦學的事跡多少會對蔡元培有所啟發。

蔡元培的父、母親，對他勤於學習和性格發展的影響至為重要。其父蔡光普（？–1877 年），字耀山，在蔡元培十一歲時去世，但其父那種「愛無差等」和「待己接人，都要到極好處」的精神，影響了蔡氏日後待人以寬的性格。蔡父死後，家道中落、撫養子女和主持家務的重任，只好由蔡母周氏一人力撐。周氏克儉度日，特重家教，教導子女待人以禮，言行舉止要得體妥當，必須慎於說話，以免得失人家，並時常提點子女失當的地方。當蔡元培深夜苦研八股文的時候，其母徹夜伴讀於側，眼見兒子常常通宵鑽研，思路卻開展不順，認為是人太疲憊之故，便提議他不如早點睡覺，待黎明起床才繼續結果蔡元培一覺醒來，思路敏捷，文筆順暢，自此養成「終身覺得熬夜不如起早」的習慣。由此可見，周氏對兒子的栽培是非常用心的，蔡元培亦坦言「所受的母教比父教為多」。而當其母身患重病時，蔡元培及其弟曾先後割肉，和藥以進，希望令其母延年消病。母親去世時，蔡元培僅二十歲，在他心目中，其母是「精明而又慈愛的」，她的苦心教導，

2 蔡元培《子民自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2；張曉唯《蔡元培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3 年），頁 6-7。

3 胡愈之〈我所見的蔡元培先生〉，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北京：中華書局，1984 年），頁 102。

4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418-421。

5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21-422。

6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20-421。

直接影響蔡氏勤加於學以至日後克己謙遜的個性發展。⁷

還有就是六叔的影響。蔡元培的六叔蔡銘恩（字茗珊）是縣學廩膳生員，精於作八股文，兼治詩古文辭，任職塾師。他教蔡元培讀書作文，及閱讀《史記》、《漢書》等古籍，自幼奠定了學問根基，終身獲益良多。蔡元培的父母去世後，其六叔負起教育他的責任。蔡元培於十七歲前後曾兩次參加小考，都由六叔大清早起來送蔡氏入試場，他第一次出門赴杭州參加鄉試時，也是與六叔同行；蔡元培亦得允隨意閱讀其六叔所藏的圖書，例如《說文通訓定聲》、《章氏遺書》、《日知錄》、《困學紀聞》、《湖海詩傳》、《國朝駢體正宗》、《絕妙好詞箋》等。從那時開始，蔡元培自由研讀有關考據和詞章的典籍，並始作散文和駢文，成績亦十分理想，可見其叔父對蔡元培實在愛護有加，於學業方面尤為著緊，可以說是引領蔡元培走上讀書之路和進入科舉仕途的一個關鍵人物。⁸

三、傳統教育的影響

蔡元培出生於一個仍是「學而優則仕」的時代，依然沿用科舉制度來考核人才，故蔡氏亦不免走上這條路，一級一級地攀登科舉考試的階梯。他十七歲時已考取了秀才，二十三歲參加浙江鄉試，中舉人，後又繼續參加北京會試，進貢士，及至 1892 年，在補行殿試中得進士，被授為翰林院庶吉士，其後升補翰林院編修，當時是二十八歲。⁹ 蔡氏在科場上算是得意的，仕途亦說得上平步青雲。其早年教育無疑是從正統儒學的訓練開始，六歲時開始讀書，其初讀的是《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詩》、《千家詩》等蒙書，繼而研讀「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及讀「五經」，即《詩經》、《書經》、《易經》、《小戴禮記》和《春秋左氏傳》，還要勤練「習字」和「對課」，當時蔡元培已學曉作平仄相對的五言詩了。十三歲時並隨王懋修（字子莊，1840–1892 年）學習，歷三年之久，開始試作八股文，王氏尤喜宋明儒學，這是由於清代的紹興一帶深受氣節及理學的影響，故王氏常講解宋代朱熹（1130–1200 年）和陸九淵（1139–1193 年）的哲學主張，並比較箇中異同，特別欣賞明代姚江學派創始者王陽明（1472–1528 年）的心學及信守氣節的明末學者劉宗周（一號戡山，1578–1645 年）。¹⁰ 事實上，宋明

7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21–427；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49。

8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24–428；張曉唯《蔡元培評傳》，頁 10–11；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49。

9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24–432。

10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19–420；蔡元培〈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28。

理學的傳統在清代依然活躍，有其生命力，蔡元培亦自言「二十歲以前，最崇拜宋儒」。¹¹ 其母去世時，蔡氏堅持躬行「寢苦枕塊」的古制，守護棺木之側以盡孝道，¹² 這種仿行古訓的行為正是深受王懋修薰陶的結果。蔡氏對其師十分敬重，王氏去世後，他曾撰〈展先師王子莊先生墓記〉一文，稱讚其師的學養「非近世間里書師所能知也」。¹³

蔡元培十七歲以後，便開始不作八股文，改而鑽研一些考據和詞章的書籍，當時對他產生影響較大的有朱駿聲（1788–1858 年）的《說文通訓定聲》、章學誠（1738–1801 年）的《文史通義》及俞正燮（1775–1840 年）的《癸巳類稿》和《癸巳存稿》。前兩者令蔡氏「確立起文字學和史學的基本觀念」，後者則「使他的思想漸趨掙脫理學的羈絆」，激發他從實際的社會層面來考慮問題。¹⁴ 朱駿聲是清代中期的文字訓詁家，因著有《說文通訓定聲》而被封為國子監博士，此書集前人研究成果，以音韻重組《說文》各字，從本義、引申、假借三方面舉出例證，又「字的排列，以所從的聲相聯；字的分部以古韻為準」，方便檢閱，故蔡氏認為芸芸專治《說文》的清儒當中，只有朱氏「是專從解經方面盡力」，指出此書能夠改正唐、宋以來「只知會意不知識諧聲的錯誤」，並把許慎（1842–1922 年）採陰陽學家之「對於天干地支與數目的解說，悉加以合理的更正」。蔡氏本想從經傳中蒐集聲近相通的例證，替此書作補充，惜最終沒法成事。¹⁵

另一本使蔡元培最為得益的是章學誠的《文史通義》，章氏是清代乾嘉時期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總共花了三十多年才完成的《文史通義》，是繼劉知幾（661–721 年）《史通》後最重要的一部史學理論專著。章氏指出當時的考據學家多長於考據而忽略經世之用，而理學末流又離事而言理，故首先提出「六經皆史」的真知灼見。蔡元培對於章氏的治史學問甚為欣賞，認為《文史通義》一書中，「對於搭空架子，抄舊話頭的不清真的文弊，指摘很詳」，又十分認同章氏提出「先有極繁博的長編，而後可以有圓神的正史」，以及「史籍中人地名等均應有詳細的檢目，以備參考」等治史主張。¹⁶

至於俞正燮的《癸巳類稿》（成於 1833 年）和《癸巳存稿》（成於 1847 年）兩書，對蔡氏的影響更為深遠。俞正燮上承江永（1681–1762 年）、戴震（1723–1777 年）諸人的學風，並擴大了考據的領域，其治史範圍十分廣泛，舉凡經義、史學、諸子、醫理、

11 有關宋明儒學在清朝的發展，可參余英時〈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宋明儒學中智識主義的傳統〉，載於氏著《歷史與思想》（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 年），頁 87-119；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49。

12 張曉唯《蔡元培評傳》，頁 10。

13 蔡元培〈展先師王子莊先生墓記〉，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160-161。

14 張曉唯《蔡元培評傳》，頁 12-13。

15 蔡元培〈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29。

16 蔡元培〈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29。

天文、道藏、方言、術數等古今中外課題，皆有精闢研究。此二書可以說是俞氏學問的精粹所在，「從它論證之廣、徵引之富、考訂之精，可以看出他學問的博大淵深」。蔡元培讀此書，深感興趣，晚年有言：「余自十餘歲時，得讀俞先生之《癸巳類稿》和《存稿》，而深好之」；並對俞氏所說的「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見解與推想，不可以後人的見解與推想去追改他們」，以及書中多篇為女子抱不平、倡議拋棄男尊女卑的見解，表示十分贊同，此書遂成為蔡氏日後大力提倡男女平等的思想根源。¹⁷

蔡元培曾對自己的治學有一番感受，他回憶道：「子民之治經，偏於故訓及大義。其治史，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其他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不能為戰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據。蓋其尚推想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政治。」¹⁸ 由是可見蔡元培年青時代的學習是與當時盛行的考據學風相配合的，重視文字的訓詁，故曾校勘《紹興先生遺書》、《鑄史齋叢書》；亦欲編《廿四史索引》、《經籍纂詁補正》等。¹⁹ 上述這些書籍對蔡氏日後講求經世致用，把學術引進民間，講求社會改革的主張，都產生了啟發作用。

四、研習西學的領悟

十九世紀末，蔡元培經歷了中日甲午戰爭和百日維新的失敗，激發了他涉獵西學的雄心。²⁰ 他除了閱讀西學著述的中譯本外，最先關心的是日本以至世界各地的國情，還明白到學習日文是認識西方新知的一條捷徑，「推想日文可速成」，其時的日文書多用漢字，容易明白，並於 1898 年設東文學社，開始研讀日文書籍。由是蔡氏迅速地翻閱了傅懋元的《游歷日本圖經》、岡本監輔的《日本史略》、沈敦和（仲禮）的《日本師船考》、繆祐孫（右臣）的《俄游匯編》、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等，甚至連有關電學、光學的中譯西書也一覽無遺，廣泛地涉獵西方的知識。²¹

17 蔡元培〈我青年時代的讀書生活〉，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29-230；蔡元培〈《俞理初先生年譜》跋〉，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7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571-578。

18 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50。

19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27-428。

20 蔡建國〈戊戌變法前後的蔡元培〉，載於王曉秋主編：《戊戌維新與近代中國的改革——戊戌維新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年），頁 683-694。

21 蔡元培〈蔡元培日記〉，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5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15，66；周佳榮《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香港：波文書局，1980 年），頁 26；周佳榮〈從清末中日關係論蔡元培思想的發展〉，載於蔡元培研究會編《論蔡元培》（北京：旅遊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477-479。

但蔡元培很快就覺得「日本人所譯西文書未爲完備」，而且「譯本漸少」，加上關於「科學、法律之類，亦有不及德、法者」，²² 他早於 1903 年上海學界風潮大起、《蘇報》案發生前已顯示了他欲前往德國求學的願望，認爲「救中國必以學」，而「游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只因「世界學術德最尊」，故隨後先到青島先學習德語，爲留學作好預備。當時蔡元培開始把日人下田次郎筆錄的《哲學要領》從日文翻譯過來，此書爲德國學者科培爾（Coppet）在日本文科大學講課的內容。蔡氏曾自稱翻譯此書時「心緒不甚寧」，又缺乏參考書，此書可謂是急就章之作，考其因大抵是他有急於準備赴德留學的計劃，冀求對德國的學術成果多點了解而已。²³

其實，蔡元培譯《哲學要領》時，已經明白到「今世治哲學者，不可以不通德語」，²⁴ 究其原因有三：「一、哲學之書，莫富於德文者；二、前世紀智度最高學派最久諸大家之思想，強半以德文記之；三、各國哲學家中，不束縛於宗教及政治之偏見，而一以純粹之真理爲的者，莫如德國之哲學。」²⁵ 可見德國與哲學扣上密切的關係，赴德求學的真正目的「不是軍事，而是他把德國的學術，或更具體地說，就是哲學」。²⁶

蔡元培對哲學的興趣早於 1899 年已見端倪，當時介紹西洋哲學的先驅人物首推嚴復（1853-1921 年），他把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年）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翻譯過來，在學界甚至社會上產生了很大迴響。蔡元培翻閱此書後，即撰有〈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讀後〉，文中解釋了赫胥黎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和「與天爭勝」的主張、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 年）的「進化學說」以及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 年）的「經濟學說」，可見蔡氏對嚴復這本譯書看得很仔細。²⁷

22 蔡元培〈譯學〉，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 卷，頁 372。

23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47；黃炎培〈吾師蔡子民先生哀悼辭〉，載於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紀念集》（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93；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54。

24 科培爾（Coppet）口述、下田次郎筆錄，蔡元培譯《哲學要領》，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9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2。

25 科培爾（Coppet）口述、下田次郎筆錄，蔡元培譯《哲學要領》，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9 卷，頁 2。

26 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頁 142。按蔡元培〈自寫年譜〉中寫到「往德國學陸軍」，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47；蔡建國指出蔡元培欲赴德國學軍事的原因，詳見氏著《蔡元培與近代中國》（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7 年），頁 95。

27 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載於綠林書房輯校《蔡元培學術論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頁 258；蔡元培〈嚴復譯赫胥黎《天演論》讀後〉，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 卷，頁 238-239。

五、出外留學的體驗

1906 年清政府倡議派人出洋留學之舉，蔡元培得悉後表現得很著急，立即回京等候消息。他寫給汪康年（1860–1911 年）的信中，曾這樣寫道：

徒以游學德意志之志，抱之數年，竟不得一機會。忽見報載學部有諮送翰林游學東西洋之舉，不能不為之心動。初亦恐進京而事不成，徒折吾節。故初則電陳介公，後又電詢王書公……蓋弟數年來，視百事皆無當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學一事耳。²⁸

可見蔡氏對赴德國學習事宜，一直是很憂心和焦急的。終於在 1907 年，他得以隨孫寶琦（1867–1931 年）赴德留學，初到柏林，「每日若干時習德語，若干時教國學，若干時為商務〔印書館〕編寫，若干時應酬同學，實苦應接不暇」，過著的是「半傭半丐」的生活；加上「德語進步緩慢」，蔡氏恐長此下去，將會「一無所得而歸國」，故萌生轉校念頭。1908 年 10 月，蔡氏終於得到中國文史研究所所長孔好古（August Conraty, 1864–1925 年）的接待，順利轉入萊比錫（Leipzig）大學，此校環境優美，較適合於靜心讀書，而且中國學生不多，免卻不少應酬，從此便開展他三年在德的求學生涯。

當時蔡元培進入由蘭普來西（Karl Lemprechts, 1856–1915 年）所創辦的文明史與世界史研究所，最多修讀的是馮德（Wilhelm Wundt, 1832–1920 年）的心理學和哲學、福愷爾（Vokelt）的哲學、蘭普來西的文明史、司馬羅（Schmalso）的美術史等，蔡氏非常留心聽書，不敢鬆懈，課餘後還請學長弗賴野（Freyer）摘解馮德的講義，可見其用心的程度。在 1911 年夏離校之前，蔡氏共選修了四十多個學科，平均每一個學期修六科，²⁹ 修讀的課程委實不少，所包含的範疇亦很廣。蔡氏曾總結自己的留德體驗，說：

……來此已逾三年。拾取零星知識，如於滿屋散錢中，暗摸其一二，而無從聯貫……欲摸索一二相當之錢以串之，而顧東失西，都無著落……又生平有小題大做之脾氣，詳於小則不能不遺其大。先知其失而終不能改，故沉游於苦海之中，而不能度也……³⁰

此實為蔡氏自謙之詞，蓋當時他對各科各門都產生興趣，渴望求取新知，實是一個舊時代的翰林書生走向新世界、新知識過程中所呈現出一種「求知若渴」的自然反應而已。

28 蔡元培〈致汪康年函〉，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0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年），頁 45。

29 蔡元培〈致吳稚暉函〉，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0 卷，頁 93；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51–455；陳洪捷《德國古典大學觀及其對中國大學的影響》，頁 146；康拉德·雷施格著，李張林、沈國琴譯〈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載於《應用心理學》第 2 卷第 2 期（1996 年，出版月份缺），頁 56–60；有關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選修科目的名稱，可參陶英惠《蔡元培年譜》（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 年），上冊，頁 191–209。

30 蔡元培〈致吳稚暉函〉，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0 卷，頁 92–93。

不過，蔡元培亦自覺要收窄學習範圍，結果把興趣集中於實驗心理學和美學方面。³¹ 究其原因，首先是由於蔡氏對於馮德這位實驗心理學的權威甚為欽佩，認為馮德所著的《生理的心理學》、《民族心理學》、《論理學》、《倫理學》、《民族文化遷流史》、《哲學入門》等，「沒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簡單的分子，而後循進化的軌道，敘述到最複雜的境界，真所謂博而且精，開後人無數法門的了」。由此可見他對馮德的科目特別用心，而對馮德的著述亦有仔細地閱讀。蔡元培更曾進入實驗心理學研究所，研究人體各官能感覺的情況。³²

在馮德的講解下，蔡元培得以認真而完全地學習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有關美學方面的主張，特別是「注重於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課題，並得馮德引導，精研康德的著作以及其他關於美學的書籍，如栗丕斯（T. Lipps）的《造型美術的根本義》（Grndlage der Bildende Kunst），從而令蔡氏產生研究美學的志趣。³³

還有，蔡元培居於德國這個充滿藝術氣息的國家，下課後閒來無事，便偕友到大學附近的美術館、民族學博物館參觀，又或觀看音樂會、歌劇和話劇等文化節目。當他留意到何時有新的劇目公演時，便約定友伴前去欣賞；當他遇到未曾讀過該劇的劇本時，必預先購一本，並於開畫前讀畢，以便於觀賞。蔡氏被濃厚的文化藝術氣氛所包圍，在耳濡目染之下，很自然地培養了對美學的興趣。³⁴ 他重點修讀了有關美學的學科，如摩曼（Meumann）的課程，當時更欲參照摩曼的方法，在美學方面做實驗的工作，希望能探討出原始美術的公例，其後因得悉國內發生辛亥革命而趕著回國，無法完成。³⁵ 蔡元培在留學的三年，努力翻譯了《倫理學原理》並編著《中國倫理學史》、《修身教科書》等。³⁶

後來，蔡元培又於 1912 年 9 月有機會赴德國的萊比錫大學學習，這次仍然以研習哲學、美學、文明史、世界史等學科為主。蔡氏並在此時期內編撰「中國文明史」的材料，後來且被顧孟餘（1888–1972 年）譯為德文。這次可以算是他第二次留學，惜由於宋教仁（1882–1913 年）被刺案發生，受孫中山（1866–1925 年）之命而於 1913 年 4 月回國，逗留的時間十分短暫。³⁷

31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57；何聯奎〈蔡子民先生對於民族學之貢獻〉，載於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紀念集》，頁 478–479。

32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53；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57。

33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57。

34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56–457。

35 蔡元培〈自寫年譜〉，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58–459。

36 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57。

37 蔡元培〈子民自述〉，見中國蔡元培研究會編《蔡元培全集》第 17 卷，頁 417；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60；金李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遼寧：

1925 年蔡元培三度留學德國，因他於前一年曾到荷蘭和瑞典出席民族學會議，討論哥倫布（Cristoforo Colombo，約 1451–1506 年）未發現新大陸前的美國民族問題，令蔡氏對民族學產生興趣來，適逢在會議中遇到德國民族學學家但采爾，指引蔡氏到著名的洪堡（Humboldt）大學進修。結果蔡氏在洪堡大學的民族博物館找到很多有關民族學的資料，開始其主力研究民族學的另一志趣。不過，因為翌年蔡氏收到教育部的電報促其回國，而結束了是次學習。在這段短暫的留學期間，他撰寫了〈中國教育的歷史與現狀〉、〈中國社會的動盪——為中國行動告各列強〉等文章，表達了對國家的關懷。³⁸

六、小 結

蔡元培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繼往開來的學人，他的治學歷程由年幼到中年，從晚清到民國，由傳統中國儒家經典的「四書」、「五經」到近代介紹西方學問的中譯西書及日文書籍，都飽覽無遺，大半生都不曾放棄學習。最值得敬佩的是，他從不留戀大好的政治仕途，反而大膽並且勇敢地走到陌生的西方國家，以四十歲不惑之年遠赴德國，憑著成熟和穩健的學問以及一己對新知識的堅持與執著，在困苦的生活環境下，努力不懈地從事學習。留德生涯中，在學習德語之餘，先後研究美學、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蔡元培一生留德三次，前後約共有五年，當中以第一次停留的時間最長，對其了解西洋哲學以至培養個人學識的影響是至為深刻的。顧孟餘曾對蔡氏的學問有以下的評論：

先生生於中國有史以來世變最亟之時代，其所接觸之人物，所聞見之事故，所觀摩之學術流派，類別繁複，因之其思想亦最少受時地之限，而能融會貫通。先生曾從事考據之學，且在大學研究所（心理學、史學）曾亦致力於精深之探討，但時時不忽略人類知識各部門之關係，及一切知識之統一與一切科學之統一。³⁹

扼要地說，蔡元培是從傳統中國家塾形式的教育轉到求取西方新知新學的途徑上，並且出國親身接觸外國文化，這對於他後來從事哲學研究、心理學研究、美學研究、民族學研究有莫大的幫助。

【作者簡介】侯勵英，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博士課程候選人。

遼寧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71。

38 按當時蔡元培仍為北京大學校長，見黃世暉記〈蔡元培口述傳略〉（上），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271；金李祥《蔡元培教育思想研究》，頁 72–73。

39 顧孟餘〈憶蔡子民先生〉，載於蔡建國編《蔡元培先生紀念集》，頁 77。

◆ 研究述評 ◆

歷史教學中文著作總目提要

周佳榮

中國的學校在二十世紀初年開始採用新式歷史教科書，不過有關歷史教學問題的探索，一向沒有受到史學界重視，討論並不怎樣熱烈。試舉兩事為例：其一，商務印書館編印的《教育雜誌》（1909—1948年）是近代中國最主要的教育刊物，但只在第31卷第11號（1941年11月）出過一個「歷史教育特輯」，三十多年間僅登載二十多篇這方面的文章而已。其二，鄭鶴聲編著的《中國歷史教學法》，是二十世紀前半期出版的重要專著，可惜此書已難得一見，鮮有學者提及。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初期，中國內地、香港和台灣相繼出現了若干種有關歷史教學的著作，其中以王德昭《怎樣教歷史》一書最具創見，至今仍具實用參考價值。1980年代中期以後，著作湧現，有數十種之多，內容亦能兼顧教學理論和實際情況。這些著作集中於歷史教學法和歷史教育學兩方面，近期還注意高等專業教育的開拓。以下介紹的書刊，大抵概括了這數十年間中國學界的成果。

爲了方便檢索，書目分成以下四組：（A）1949年以前出版的著作；（B）1950年以來中國內地出版的著作；（C）1950年以來香港地區出版的著作；（D）1950年以來台灣地區出版的著作。

（A）1949年以前出版的著作

討論歷史教學法的中文著作，就現存書目所見，以夏清貽著《龍門師範學校講義歷史教授法》（上海：開明書局，1906年）爲最早，這是一本只有三十三頁的小冊子，著者是留日學生。筆者搜集得到的，有以下三種：（一）吳研因、王志瑞著《小學歷史科教學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二）胡哲敷著《歷史教學法》（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三）鄭鶴聲編著《中學歷史教學法》（南京：正中書局，1936年）。

此外，還可注意下列兩種小書：一、鄭鶴聲著《歷史教學旨趣之改造》（南京：正中書局，1935年），列爲「教與學月刊社叢編」，僅有三十一頁，分四節談論歷史教學中應注意建立民族意識、恢復民族自信力等問題。二、齊思和著《西洋史教學之基本問題》（北

平：函雅堂書店，1941 年），列為「西洋史小叢書」第一種，僅有四十二頁，分六章探討西洋史教學的目的、以中國眼光治西洋史、現今中國西洋史教學的方法、國別史的重要、美國史的重要等問題。

抗日戰爭結束後不久出版的，有徐文珊著《歷史教育論》（重慶：史學書局，1945 年），一百五十一頁，分十二章論述歷史與民族、現實、將來、文化的關係，史學風氣的改革，歷史教育的實施，以及歷史觀等問題。李絜非譯英國屈勒味林（G. M. Trevelyan）著《歷史教育》（*History and the Reader*；上海：華夏圖書出版公司，1948 年），列入「現代文庫」第二輯，是一本僅有二十頁的小冊子。

有關清末民國時期歷史教學論著及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出版情況，可參考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1995 年）的「歷史・傳記・考古・地理」卷（上、下冊）和「中小學教材」卷。

【A1】吳研因、王志瑞著《小學歷史科教學法》，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 年。（74 頁）

這是最早論述歷史科教學方法的中文著述之一，內容集中於探討小學程度課程。全書共有三章，首先，第一章〈歷史是甚麼和爲甚麼要學習歷史〉，指出在學校內教學歷史的最大目的，是要使學生能夠了解世界，其次便是他們得到一點「歷史的方法」。第二章〈歷史科的課程〉，分爲以下六節：（一）兒童所需要的歷史是甚麼；（二）編訂歷史課程的基本原則；（三）歷史教學在何時開始；（四）歷史科要與他科合併嗎；（五）對於新學制歷史課程綱要的批評；（六）課程綱要的擬例。第三章〈歷史教學的方法〉，包括以下八節：（一）怎樣運用歷史科的課程；（二）怎樣引起學習歷史的興味；（三）教學歷史應該用些甚麼材料；（四）怎樣和兒童討論歷史問題；（五）怎樣使用歷史教科書；（六）怎樣使用補充讀物；（七）怎樣使用圖畫模型地圖和表格；（八）怎樣考查歷史科的成績。

【A2】胡哲敷著《歷史教學法》，上海：中華書局，1932 年。（251 頁）

本書共分十五章，依次爲：（一）教學法的意義；（二）甚麼是歷史教學法；（三）歷史的目的與教歷史的目的；（四）吾國小學校與中學校的歷史學科；（五）教材的選擇與配置；（六）傳記與社群在中小學歷史教材上的地位；（七）教科書之運用；（八）教學法的研究；（九）教授歷史應注意的幾點；（十）中小學歷史學科與其他學科的聯絡；（十一）上課與指導；（十二）模型圖表在歷史教學上的效用；（十三）歷史考試的問題；（十四）史學研究會；（十五）參考書目提要。就內容來分，前三章爲歷史教學法概論，第四至七章討論學校課程、教材和教科書，第八章至十一章分述教學方法和教歷史要注意的問題，最後四章介紹與配合歷史教學相關事項。

【A3】鄭鶴聲編著《中學歷史教學法》，南京：正中書局，1936年。(11+121頁)

本書共分八章，依次討論：(一)歷史的價值；(二)歷史的範疇；(三)教師的修養；(四)教材的研究；(五)教科書的評論；(六)教學上的設備；(七)教學方法的改進；(八)學生成績的考試。末附〈鄭鶴聲中小學本國史教授的目標〉及〈鄭鶴聲中小學本國史教材的運用〉兩篇。這是一冊很有見地的著作，現時還具一定的參考價值。

(B) 1950年以來中國內地出版的著作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內地出版的歷史教學專著比清末民國時期大大增加。筆者所見的，1950年代有三種，1960年代和1970年代缺，1980年代有四種，1990年代有十六種，2000年以來有十一種，總數達三十多種。扼要地說，歷史教學在建國初期已展開討論，後來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中斷了二十多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教育的日漸普及和時代需要，有關歷史教學的探索便愈來愈受重視了，最近十餘年尤為可觀。

近期中國內地的歷史教學論著大體集中於兩方面：其一是歷史教學法，于友西主編《中學歷史教學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可為代表；其二是歷史教育學，趙亞夫著《中學歷史教育學》（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1997年）較受注意。

此外還應指出，中國內地著作對歷史教學探討已趨向深層化，如張保華主編《中學歷史教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在較大程度上參考了國外的歷史教學法和歷史教育體系論，如張靜、李曉風、姚嵐、孫楠著《歷史學習方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葉永廣著《歷史·影視·教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則討論了歷史學科、影視信息和素質教育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B1】察哈爾文教社編輯《歷史教學新編》，張家口：新華書店發行，1950年。(101頁)

本書收集了十七篇文章，分為兩部份：第一編是「怎樣認識歷史」，包括科學歷史的認識和教學、講授歷史必須和客觀事物相印證、學歷史要從古人的生活裏吸收自己的生活力量、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歷史的實在性和規律性、怎樣看歷史人物、蘇聯中學歷史課程中的思想教育；第二編是「怎樣教歷史」，包括教學與現狀結合、聯繫現實、針對學生思想狀況、「提問」和「討論」、近代史教學、歷史教學總和和計劃的舉例、怎樣運用歷史科的實物教學，附錄「歷史節日的補充教材」。

【B2】教育資料叢刊社編《中學歷史教學的改進》，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

(4+2+125頁)

本書的〈前記〉指出：中學歷史教學的改進，必須遵循下列三個途徑，即樹立科學的歷史觀點；明確歷史教學的任務；改正形式主義的教學方法。正文收錄有關歷史教學

的文章十五篇，分爲五組：（一）歷史教學概論，包括王德培〈提高中學歷史教學的幾個基本問題〉及〈論中學歷史教學的理論與實際〉、郭頤〈目前歷史教學的幾個問題〉、邵凱〈關於歷史教學中的幾個問題〉、張守常〈歷史教學中的立場問題〉；（二）歷史教學與愛國主義教育，計有翁達藻等〈怎樣在歷史教學中貫徹愛國主義教育〉、周一良〈推進愛國主義歷史教育的幾個具體問題〉、林幹〈怎樣通過歷史課培養民族自尊心自信心〉；（三）歷史教學經驗，有武漢市中等學校歷史業務學習組〈武漢市各中等學校一年來的歷史教學〉、孫鳳林〈哈爾濱市中學歷史觀摩教學初步總結〉，及蘇和林斯基作、達克譯〈講授歷史的一點經驗〉；（四）中國近代史教學，有胡華、彭明〈關於中國近代史的教與學〉和秦慰儉〈中國近代史教學的任務〉；（五）附錄，收翦伯贊〈怎樣研究中國歷史〉、范文瀾〈關於《中國通史簡編》〉兩篇。

【B3】北京市中小學教職員學習委員會編《歷史教學講座》，北京：大眾出版社，1954年。（38頁）

本書收集三篇關於歷史問題的講稿，包括：翦伯贊〈怎樣研究中國歷史〉、榮孟源〈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劉桂五〈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這些文章都是三位作者在北京1950年中等學校歷史科暑期學習會上講過的，分別談到研究歷史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如何處理歷史人物，以及如何處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問題，爲歷史教師提供教學上的基本知識和態度。

【B4】趙恆烈著《歷史教材教法舉要》，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3年。（2+2+330頁）

本書收錄有關歷史教學和教材的文章三十七篇，內容大致可以分爲四個部份：（一）歷史教育總論，有〈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爲甚麼要學習中國歷史〉等；（二）對編寫歷史教科書的探索，如〈中國歷史教材編寫中的幾個問題〉、〈組織歷史教材的方法〉、〈歷史教材中寫人物的方法〉等；（三）從教材的角度談歷史教學中的問題，包括〈關於我國奴隸社會土地所有制（井田制）的幾個教學問題〉、〈怎樣理解秦始皇實施的「以吏爲師」〉、〈論歷史簡表〉、〈詩歌與歷史教學〉等；（四）從方法論的角度談歷史教學中的問題，計有〈歷史教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略談歷史課中的啓發式教授法〉、〈如何培養學生學歷史的興趣〉、〈怎樣寫歷史教案〉、〈怎樣總結教學經驗〉等。

【B5】臧嶸、周發增編，蘇壽桐審訂《歷史教學研究的新探索——全國歷史教學研究會論文集》第二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3+338頁）

本書是中國教育學會歷史教學研究會編輯的論文集，共收文章三十九篇及附錄一篇，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關於學科教育思想、目的和任務的，有盧士林〈貫徹「三個面向」指示精神，改革歷史教學〉、吳景賢〈歷史教學的目的——總結經驗和進行

思想教育〉、包啓昌〈歷史教學必須全面貫徹學科目的任務〉等；(二) 討論教學原理、心理及智能培養的，有羅超〈歷史教學與培養創造型人才〉、劉宗華〈歷史教學如何培養學生的觀察分析能力〉、陳亞昌〈研究小學生心理，改進小學歷史教學〉等；(三) 比較歷史教學，有白月橋〈中國、蘇聯歷史教學比較〉及寧裕先、程壽朋〈比較歷史學與歷史教學〉；(四) 愛國主義、教改研究和教材編寫，有余支鵬、孫以俊〈歷史課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幾個問題〉、馮堅〈談談考古材料和中學歷史教學〉、王宏志〈關於講述民族史的幾點想法〉等；(五) 爲了擴大同國外的學術交流，以及加強國際學術信息，還收錄了齋藤秋男〈爲發展日中兩國的歷史教育的學術交流而努力〉、吉田悟郎〈編輯歷史教科書的經驗〉、二谷貞夫〈兒童、學生的歷史認識和歷史學習〉及詹姆斯·L·亨德森《世界歷史教學》(部份)。

【B6】于友西主編《中學歷史教學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348頁)

本書探討中學歷史教學法的任務、過程、原則、內容、方法等，並附有實例和圖表。正文共有十四章，依次爲：(一) 緒論；(二) 中學歷史教學的任務；(三) 中學教學計劃、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四) 中學歷史教學的過程及其本質；(五) 歷史知識的特點和中學歷史教學原則；(六) 中學歷史課堂教學的類型和方法；(七) 怎樣講人物地點和時間；(八) 鄉土史教學；(九) 中學歷史教學的現代化手段；(十) 中學歷史課的課外教學活動；(十一) 歷史知識的復習和檢查；(十二) 中學歷史教師的備課；(十三) 中學歷史教師的進修；(十四) 中學歷史教學中對學生學習歷史方法的指導。書末附錄具有代表性的參考文章十餘篇。

【B7】中南五省(區)師專教材編委會編《中學歷史教材教法》，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294頁)

本書共有十四章：第一至四章研究中學歷史教學法研究的對象、任務和方法、中學歷史教學的目的任務，中學歷史教學的過程和教學原則以及中學歷史課的基礎知識教學；第五章研究中學歷史教學大綱、教科書和教學參考書的指導作用；第六章至十二章研究有關中學歷史課堂教學的一些主要問題；第十三、十四章研究教學實習和中學歷史教師進修的問題。

【B8】甘肅省歷史學會、西北師大歷史系編《歷史教學與研究》，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93年。(426頁)

本書共分六部份，包括「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國古代文獻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研究」、「世界歷史研究」和「教學法研究」，只有最後一部份討論歷史教學法，收錄馬志榮〈談談中國近代史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的幾個問題〉、景生明〈苟利國

家生死以》、趙俊嶺〈歷史教學十法〉三篇文章。

【B9】周發增、張顯傳、崔榮主編《歷史教育學新論》，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3年。（2+397頁）

本書第一章〈總論〉探討歷史教育學的產生及其意義，研究對象和任務；第二章〈中國的歷史教育〉，敘述古代、近代、現代歷史教育及其展望；第三章〈國外的歷史教育〉，介紹英、美、日、德、法、蘇等國的情況；以下五章，依次為〈歷史教材論〉、〈學校歷史教育〉、〈社會歷史教育〉、〈歷史教育的方法論〉、〈歷史教師論〉。

【B10】金相成主編《歷史教育學》，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272頁）

本書是金相成、郭景揚、聶幼犁、郝陵生編著，首二章為〈緒論〉及〈我國歷史教育發展概述〉，第三、四章探討歷史教育的價值論和基本任務、大綱、課程和教材，第五、六章闡論歷史教學目標、歷史教育過程和組織形式，第七至九章分述歷史教育中的知識學習與掌握、情感及其培養、能力及其形成，第十章為〈歷史課堂教學方法〉，以下四章依次為〈鄉土教學和鄉土史教材〉、〈歷史教育的學業評價〉、〈歷史教師的素質和進修〉、〈歷史教育的科學研究〉。

【B11】李勤德、關耐冬編《歷史教學研究新論》，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1994年。（206頁）

本書以專題研究的形式組成，除〈緒論：歷史與歷史教學〉外，包括九篇文章，依次為：〈歷史學認識對象的特徵與歷史教學〉、〈歷史思維與歷史教學〉、〈補充資料在歷史教學中的運用〉、〈歷史教學的縱向性和橫向性〉、〈歷史教學的社會功能和歷史功能〉、〈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電化教學與現代化教學手段〉、〈第二課堂的開闢與多樣化形式〉及〈歷史教師的基本素養和專業水平〉。

【B12】魏授章著《歷史課堂教學藝術》，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304頁）

本書共有十章，分別討論導言設計、板書設計、課堂提問、教學語言、地圖教學、插圖教學、圖示教學、結語設計、指導練習、使用教材的藝術，旨在從十個具體要素去探索和尋求達到歷史課堂教學藝術活動整體優化的途徑。書中列舉了不少實際可用的例子，對歷史科教師很具啟發性。

【B13】王鐸全、李稚勇編著《比較歷史教育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345頁）

本書對歐美國家、前蘇聯、日本、韓國以及香港、台灣地區和中國大陸的歷史教育（主要是中學教育）狀況，分九章從歷史教育目標、課程設置、歷史教材、教學方法、學習指導、歷史考試、國際交流與研究熱點等各個方面，作出探討和比較，是中國第一

本歷史教育比較研究的專著。

【B14】孫恭恂編著《歷史教學的藝術與技巧——歷史教育論稿》，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95年。（343頁）

本書共分四章：（一）〈一個人類古老而閃爍時代光輝的課題——歷史教育〉探討歷史教育的起源、發展和社會功能；（二）〈歷史教育的特點、途徑和方法〉論述歷史教育的源泉和依托、原則和必由之路、手段和方法；（三）〈青少年健康成長不可缺少的一門功課——歷史教學〉介紹歷史課程的設置、歷史教學大綱和歷史教科書；（四）〈歷史教學的技能、技巧〉討論歷史教師的備課、歷史課堂教學、歷史課外活動、歷史鄉土教學、歷史課的復習與考試。

【B15】蘇壽桐著《史編拾遺》，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12+392頁）

本書收錄蘇壽桐所撰的四十篇文章，其中有四份之三是關於歷史教學的，討論的問題也很全面和深入，可以視為一冊歷史教育論集。全書分為五個部份：（一）史學——包括〈中國古代歷史教育初探〉、〈我國封建時代歷史教育和教材〉及其他五篇有關中國近代史的論文；（二）史編——計有〈中學歷史教科書三十年〉、〈中國歷史教育的過去和現狀〉、〈中學歷史教材的沿革、繼承、借鑑與展望〉、〈編好歷史教科書的幾個原則問題〉、〈歷史教學、歷史編輯與歷史研究的關係〉等十四篇；（三）史論——有〈歷史課必須重視愛國主義教育〉、〈歷史研究與歷史教材中的幾個問題〉、〈當前歷史教學努力堅持的方向〉等九篇，主要討論歷史教育的功用及其與國情教育的關係；（四）史評——收〈為普通中學高中設置歷史課進一言〉、〈日本歷史學家對侵華戰爭早有定論〉、〈香港台灣中學中國歷史課本評介〉、〈何炳松先生《歷史教學法》讀後〉四篇；（五）其他——有序文等六篇。著者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編寫歷史教科書的第一代人，本書基本上總結了他數十年來的經驗和見解。

【B16】王鐸全主編《歷史教育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6年。（559頁）

本書是由上海、廣西、華中、西北、南京五所師範大學從事歷史教育研究和教學工作的教師集體編寫的，較系統地論述了歷史教育的理論與實踐。除〈緒論〉外，共有十九章：首兩章探討中學歷史教育目標，第三、四章介紹中學歷史課程設置和教材，第五章分析歷史知識特點和歷史教學原則；第六至十一章講述中學歷史教學過程、課堂教學的一般方法、課堂教學模式、傳統直觀教具和現代傳播技術，以及中學歷史課的鞏固與復習；第十二章為〈歷史教師的備課〉，以下五章依次介紹中學歷史課外教育活動、學習指導、學業評價與教學評估、教學觀摩與教育實習，並探討中學歷史教師的素質；最後第十八、十九兩章，闡論歷史教育研究的主要分法、發展與現狀。

【B17】劉芄編著《歷史學科考試測量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159頁）

本書編著的目的，是爲了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對歷史學科的考試量進行初步總結，以及試圖說明考試測量與素質教育並不是矛盾的。當代的考試測量涉及到的主要問題，是考試能力的要求、題型及題型功能、歷史學科的知識體系；這三個問題要解決考試測量的目標、形式和內容，本書就是將這三個問題編爲〈歷史學科的能力要求〉、〈題型功能評述〉、〈歷史學科的知識體系〉三章加以討論。

【B18】趙亞夫著《中學歷史教育學》，北京：中國建材工業出版社，1997年。（401頁）

本書共分七章：（一）〈總論〉說明中學歷史教育的產生及其意義，研究對象和任務、研究基礎；（二）〈中學歷史教育課程理論〉分析現代課程理論對中國中學歷史教育課程改革的啓示作用，中學歷史教育目標的變遷及教育目標理論的運用，中學歷史課程的設置和歷史教材；（三）〈中學歷史教學理論〉討論中學生的心理認知特點，中學歷史學習過程和教學過程；（四）〈中學歷史學習指導理論〉闡釋授課設計的意義與課題、學年及單元指導計劃的制定、中學歷史課堂教學的指導方法，以及利用現代化教學手段的學習指導；（五）〈中學歷史教育的評價理論〉探究中學歷史教育評價的目的與意義、內容與方法、種類和特徵，及歷史學科的試題編制與評價方法；（六）〈中學歷史教師理論〉剖明教師理論的產生及其應用前景，中學歷史教師的素質、進修和資格評定；（七）〈中日韓三國學校歷史教育比較〉，從歷史教育理論研究概況、歷史教育目標與課程的基本特徵、歷史教科書的編制與使用比較中國、日本、韓國的異同。書末附有主要參考書目。

【B19】姬秉新主編《歷史教育學概論》，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年。（2+432頁）

本書由姬秉新、藺子武、馮永寧、寧維祥、楊東義、何瑞春、歐陽正宇編著，採用分講專論的形式把歷史教育學的基礎部份構建出來，共有八講，依次爲：（一）導論；（二）歷史教育論；（三）歷史課程論；（四）歷史教育原理論；（五）歷史教育方法論；（六）歷史課外教育論；（七）歷史學習論；（八）歷史教師法。

【B20】白月橋著《歷史教學問題探討》，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97年。（7+458頁）

本書是全國教育科學「八五」規劃國家教委級重點科研課題，共有八章，內容集中於討論歷史認識、歷史思維、教學內容、教學方法、歷史教科書、歷史習題等歷史教學的基本問題，以及對歷史教學現狀調查、初步實驗效果的報告。書首有馬金科、趙恆烈的序言兩篇。

【B21】彭景華、高鵬飛主編《中學歷史教學法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8 年。
(183 頁)

本書自〈緒論〉以下，共分十講：(一) 歷史教學目的研究；(二) 歷史教學原則研究；(三) 歷史教學規律及過程研究；(四) 大綱、教材、教師教學用書和鄉土史的使用研究；(五) 歷史課堂教學的類型及方式研究；(六) 歷史教學方法研究；(七) 歷史教學直觀手段研究；(八) 歷史知識的鞏固與檢測研究；(九) 培養歷史學習能力的研究；(十) 歷史學法指導研究。末附主要參考書目。

【B22】朱光明著《中學歷史課堂教學方法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年。(3+350 頁)

本書分為四章：(一) 巧設疑問，善開「茅塞」——中學歷史問題研討教學方法；(二) 導讀編卡，引思益智——中學歷史編卡教學方法；(三) 以「講」為主，「讀」「問」相輔——讀、講、問三結合教學方法；(四) 情隨境生，智從情轉——歷史情境創意教學方法。作者總結和探討了中學歷史課堂教學的四種方法，按基本原理、設計基礎、實施藝術、教例及說明四個方面加以介紹，務求做到既遵循歷史教學活動的基本原則，又結合當前中學歷史教學的實際。書末附錄〈駕馭「龍頭」，因勢利導——談談課堂導言的設計〉和〈把握心理，導向「成功」——談談「成功復習法」的運用〉兩篇。

【B23】劉宗華、孫恭恂著《劉宗華歷史教學藝術與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 年。
(14+156 頁)

本書列入戴汝潛主編「全國著名特級教師教學藝術與研究叢書」第二輯，包括〈探索篇〉(劉宗華撰)和〈研究篇〉(孫恭恂撰)兩部份。前者探討：(一) 成長為一名合格教師；(二) 課堂教學辛勤耕耘；(三) 認識、探索與改革。後者闡述：(一) 歷史教學必須遵循著本學科的特點；(二) 必須確切地掌握史論結合；(三) 歷史教師的社會責任感。書中還有顧明遠、閻立欽、戴汝潛、胡鋼泰等人所撰的相關文章。

【B24】夏子賢主編、吳幼雄副主編《中學歷史教學法》，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283 頁)

本書根據 1991 年的初版本加以修訂重訂，列為「新世紀高等師範院校教材」。全書共分十五章：(一) 中學歷史教學的地位和任務；(二) 中學歷史教學大綱；(三) 中學歷史教材；(四) 中學歷史教學的原則；(五) 歷史概念的 formed 和發展；(六) 歷史課堂教學的地位和類型；(七) 歷史課堂教學的基本方法；(八) 歷史課的直觀教學；(九) 歷史教師的備課；(十) 歷史課的課堂教學藝術；(十一) 歷史學習的基本訓練；(十二) 歷史知識的復習、檢查與成績評定；(十三) 歷史課的第二課堂；(十四) 高師歷史專業學生的教育實習；(十五) 中學歷史教師的在職進修與教研活動；書末附有主要參考書目。

【B25】王春良著《歷史教學諸問題研究》，長沙：岳麓書社，2000年。（6+341頁）

本書收錄著者自 1980 年代以來所寫的文章三十多篇，分為以下幾類：（一）九年義務教育初中《歷史教學大綱》審查說明；（二）關於日本的反動歷史觀，包括〈歷史教學要注意肅清日本反動的歷史觀〉、〈歷史教學要認真闡明釣魚島列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拉貝日記》與歷史教學〉三篇；（三）蘇中關係與蘇聯對外關係史問題，計有〈論日俄（蘇）對中國東北地區的爭奪〉、〈論日本反蘇武裝干涉與蘇俄對日策略〉、〈歷史教材應怎樣寫「蘇聯農業集體化」〉、〈簡論 1918—1945 年蘇俄（蘇聯）對中國外蒙古的言行〉、〈論中東路事件與蘇聯從中國佔去黑瞎子島〉、〈原子彈在日本投降中的作用〉、〈論中國抗日戰爭與日本「北進」戰略的牽制〉、〈論《波茨坦公告》與波茨坦會議的關係以及蘇聯為甚麼未在《公告》發表時簽署〉、〈論波蘭三次被瓜分與「卡廷慘案」〉、〈「三八線」的由來〉十篇；（四）正確理解民族民主運動史的有關問題，包括〈正確理解「全世界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正確認識十月革命對 1919—1922 年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影響〉、〈略論甘地的歷史作用〉、〈論印度獨立後土地制度與農業的演變〉、〈簡論努喬馬與納米比亞獨立〉、〈20 世紀中期的阿根廷與庇隆政府的內外政策〉六篇；（五）歷史教學要注意科技史內容，計有〈原子能、電子計算機、航天技術發展簡史述略〉及〈科學技術革命與知識經濟的關係〉兩篇；（六）王春良主要論著目錄索引。

【B26】余偉民主編《歷史教育展望》，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344頁）

本書是「學科教育展望叢書」的一種，由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組織編寫。余偉民撰〈導論：21 世紀與歷史教育〉，闡述了 21 世紀人類社會的發展趨勢和新世紀歷史教育面臨的課題。以下分為五章：（一）張耕華、劉善齡撰〈歷史教育的歷史回顧〉；（二）蔡堅撰〈變革中的歷史教育：現狀與問題〉；（三）李月琴撰〈變革中的歷史教育：他山之石〉；（四）張耕華、余偉民撰〈新世紀的歷史教育：理念的突破〉；（五）李月琴撰〈新世紀的歷史教育：改革與創新〉。書末附錄〈英國歷史學科國家課程標準〉和〈全日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實驗稿）。

【B27】白月橋著《歷史教學問題探討》，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年。（242頁）

本書是全國中小學教師繼續教育專業課教材，由教育部師範教育司組織評審。內容共分十一章：（一）學校課程的時代特徵；（二）傳統課程與現代課程觀；（三）中外歷史科設計變革；（四）社會科設計回顧與改革趨勢；（五）歷史科創新問題；（六）歷史認識問題；（七）歷史思維問題；（八）教學內容與方法問題；（九）歷史教科書問題；（十）歷史習題問題；（十一）歷史科評價問題。著者在〈後記〉中指出，本書的目的希望「有助於歷史教育工作者拓寬學術視野，拋棄學科本位主義，樹立符合素質教育要求的現代

課程觀、教學觀和學生觀。」

【B28】張保華主編《中學歷史教學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351頁)

本書是為中學教師進修歷史專業而編的教材，共有十六章：(一)中學歷史教學目的與任務；(二)中學歷史教學過程與階段；(三)中學歷史教學規律與原則；(四)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與教材；(五)中學歷史教學方法與手段；(六)中學歷史課堂與課外教學；(七)中學歷史教學導課與終課；(八)中學歷史教學板書和提問；(九)中學歷史教學模式與風格；(十)中學歷史教學環境與管理；(十一)中學歷史備課與教案；(十二)中學歷史教學資料與科研；(十三)中學歷史學科能力與思維；(十四)中學歷史學習心理與方法指導；(十五)中學歷史學業評價與考試命題；(十六)中學歷史教師素質與繼續教育。

【B29】朱漢國、王斯德主編《歷史課程標準解讀》，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200頁)

本書由國家基礎教育歷史課程標準組主持編寫，列為「走進新課程叢書」之一。內容分為四部份：(一)課程改革的背景、思路與課程標準的主要特點，包括〈課程改革的背景與思路〉、〈歷史課程標準的制定與主要特點〉兩章；(二)課程標準本體解讀，共有七章，首先是〈課程目標解讀〉，以下分別是中國古代史、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現代史的內容標準解讀；(三)課程標準實施的若干建議，計有〈關於教材編寫建議〉、〈關於教學建議〉、〈關於評價建議〉、〈關於課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四章；(四)問題與展望，分為〈知易行難——歷史課程改革面臨的困境〉和〈任重道遠——歷史課程改革發展的前景〉兩章。

【B30】趙克禮主編《歷史教學論》，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448頁)

本書是「21世紀高等師範院校學科教學論」系列教材的一種，內容共分十一章：(一)中學歷史課程；(二)中學歷史課程標準與教材；(三)中學歷史教學理論；(四)中學歷史教學；(五)中學歷史教學技能；(六)中學歷史現代化教學；(七)中學歷史學習；(八)歷史教學的評價；(九)歷史教學的準備工作；(十)歷史專業教育實習；(十一)中學歷史教師的學習與研究。

【B31】齊健、趙亞夫等著《歷史教育價值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22頁)

本書是趙亞夫主編「歷史新課程研究系列」之一，旨在配合全日制義務教育階段歷史新課程的實施，幫助歷史科教師以新視野重新審視歷史教育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意義，高質素的教材以及歷史學習方式等等。〈序論〉強調歷史教育要給國民自信力，第一章〈追尋歷史教育的本義〉，探討歷史教育與歷史教學、從歷史教學法到歷史教育論等「不是問

題」的問題，和歷史教育的人文屬性。第二章〈體現新價值的歷史課程變革〉，闡述歷史課程的涵義及研究現狀、從《歷史教學大綱》到《歷史課程標準》、歷史課程改革的背景、歷史課程改革的思路及歷史課程改革體現的新理念。以下各章，分別從公民教育、人文教育、終身教育、個性教育和創新教育各個方面申論歷史教育的意義：第三章〈公民教育：歷史教育的顯性功能〉，究明歷史教育的民主含義、公民性和現代性；第四章〈人文教育：歷史教育的本質〉討論歷史教育的人文性、道德性、情感性、養成性、審美性和世俗性；第五章〈終身教育：歷史教育的時代要求〉說明終身教育觀念與學習化社會，及終身教育觀念指導下的歷史教育革新；第六章〈個性教育：歷史教育的核心目標〉主要探索歷史教育中的個性教育內涵，和歷史學科實施個性教育的基本對策；第七章〈創新教育：歷史教育的推動力〉辨析創新教育幾個理論問題，並探討歷史學科中的創新教育問題。總的來說，本書是同類著作中理論性較強、內容較新穎的，書中所涉及的，都是二十一世紀歷史教育的重要課題。

【B32】于友西主編《中學歷史教學法》（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382頁）

本書是在 1988 年初版的基礎上加以修訂，並增入中學歷史學科的教學模式等新內容，以及 1990 年代的科研成果，分為十二章：（一）〈緒論〉；（二）〈中學歷史課程的設置和課程標準〉；（三）〈中學歷史教科書及教師用教學參考書〉；（四）〈歷史知識的特點和歷史教學的原則〉；（五）〈中學歷史學科的教學過程〉；（六）〈中學歷史學科的教學模式〉；（七）〈中學歷史教學的基本方法〉；（八）〈中學歷史教師的備課與授課〉；（九）〈中學歷史教學中的學習指導〉；（十）〈中學歷史教學中的復習與評估〉；（十一）〈師範院校學生的歷史教育實習〉；（十二）〈中學歷史教師的進修〉。

【B33】張靜、李曉風、姚嵐、孫楠著《歷史學習方略》，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244頁）

本書除〈序論：歷史教育要給國民自信力〉外，共有六章。第一章〈歷史學習的心理學基礎〉，第二章〈歷史學習中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第三至六章分別論述四種歷史學習方法：（一）材料研習與運用；（二）體驗與思考；（三）合作與交流；（四）評價與反思。〈後記〉指出此書作者「結合多年來對歷史學習心理學和歷史教育的研究與實踐，潛心鑽研，構建了歷史學習結構，並希望能夠在教學實踐中得到進一步完善。」

【B34】葉永廣著《歷史·影視·教育》，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年。（353頁）

這書討論歷史、影視、教育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正如奚建華在〈序〉中所說，「是一本在課改背景下，探索歷史學科與影視信息結合，實施素質教育的專著」。內容分為兩部份：（一）「感悟篇」，包括：課程改革與影視信息、影視資源的開發和影視信息的應用。

作者以其十七年間收集影視資料和實踐研究為基礎，闡述如何在歷史學科各個領域中採用影視教育手段。(二)「實踐篇」，包括教學設計、課堂實錄和研究性學習課題。作者匯集了大量應用影視於教學實踐的課例，可供中學歷史教師參考。

(C) 1950 年以來香港地區出版的著作

香港出版的歷史教學專著，以柳存仁著《中國歷史教學法略論》(香港：香港語文學社，1960 年)和陳安仁著《歷史教育通論》(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 年)二書為最早。游黎麗玲、陸鴻基《香港初中中史科和社會科課本裏的性別角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1988 年)和周佳榮著《中國歷史科高中新課程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 年)，是論述相關問題的小冊子。周佳榮著《潮流遠近——歷史的教與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7 年)和《歷史絮語——教與學的文化情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年)，收錄了作者自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的札記和隨筆，當中有若干篇都談到歷史教學問題。

1990 年代有兩種論文結集，一是《中國歷史教學》(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一是周佳榮、李金強主編《通古今之變——中國歷史教學綜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年)，大抵反映了 1980 年代以來的歷史教學發展狀況。由於近年教育的步伐迅速，在二十一世紀初頭的幾年間，香港地區已出版了三種有關歷史教學的專書：其一是楊秀珠主編《老師談教學：歷史教學》(香港：中華書局，2003 年)，其二是梁炳華主編《兩岸四地中國歷史教學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2004 年)，其三是方駿主編《新世紀的歷史教育》(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6 年)，當中部份文章是外地學者所撰。

總的來說，香港出版的著作，較多引用外國的歷史教學理論和經驗，相對於其他地區，香港對兩岸四地以及海外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發展最為注重，在一定意義上起了交流的作用。

【C1】柳存仁著《中國歷史教學法略論》，香港：香港語文學社，1960 年。(80 頁)

本書分為十章，依次討論赫爾巴特五部教學法能否實行於中國歷史教學，教案編製的過程和它們的部份使用，教具怎樣應用：它的原則是甚麼？教材之詳略以能否說明主要線索為主，引起動機及故事化的敘述，「何以」——歷史的因、果和演變，關於學術思想的演變，關於學術思想的演變，「如何」——事物發生的經過真相，古今地名與中外人地名，歷史教學的目標。書中的好處，正如作者在〈序〉中所說：「就是它有許多現實的活例，因為它不是向壁虛構，閉門造車的作品，也許它可以使一班熱心教學方法或研究中國歷史的人，知道一點此時此地這一部門教學使用新舊方法各方面的比較。」

【C2】陳安仁著《歷史教育通論》，香港：人生出版社，1963 年。(104 頁)

本書討論歷史教育以及歷史與教育二者的關係，共分七章：(一) 導言；(二) 歷史教育的知識論；(三) 歷史教育的科學觀；(四) 人類歷史之生存經濟動力與知識動力；(五) 人類歷史之精神動力與知識之策應；(六) 人類史之文化思想動力；(七) 墨學之教育知識與時空一致論。另有〈結論〉及附錄三篇。

【C3】游黎麗玲、陸鴻基《香港初中中史科和社會科課本裏的性別角色研究》，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研究所，1988 年。(34 頁)

本書列為香港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第二十四號，是「性別角色研究計劃」的項目之一。內文包括：(一) 引言；(二) 有關的研究；(三) 課本分析的工具和程序；(四) 中史科課本裏的性別角色；(五) 社會科課本裏的性別角色。作者認為初中課程的中國歷史科和社會科「對傳達有關性別角色的訊息，大概比較其他科目來得集中、系統和全面」，又據其統計結果，指出中史課本忽視古代中國婦女，原因有三：其一、是中國歷史的研究至今仍集中在古代男子的事功，很少探索古代女子的角色；其二、是教育署的課程偏重政治史而忽略社會史，自然集中介紹男性的事功；其三、是課本編者的主觀判斷，對於應該介紹女性歷史人物有不同的決定。

【C4】周佳榮著《中國歷史科高中新課程析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3 年。(29 頁)

本書是「香港教育研究報告」之一，探討 1990 年編訂、1993 年起施行的《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中四至中五適用)。內容包括：(一) 中國歷史科課程的頒佈概況；(二) 高中新課程的組織和特色；(三) 高中新課程的內容和重點；(四) 高中新課程的教學目的和方法；(五) 中學會考新課程的試卷形式和趨向；(六) 高中新課程與其他課程的關係。附錄新課程的教學大綱。

【C5】周佳榮著《潮流遠近——歷史的教與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87 年。(183 頁)

本書收錄一百六十多篇文章，是作者的教研隨筆，討論的內容包括史學與歷史教育，依主題分為六輯：(一)「歷史潮流的兩岸」，圍繞著史學研究和學術觀點等問題；(二)「亞洲與世界」，從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說起，而集中於討論亞洲地區；(三)「中日之間」，透過近代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交流及障礙，展望兩國新關係的建立；(四)「從日本到香港」，一方面介紹日本事物，一方面聯想到香港種種相關的情況；(五)「在中國的土地上」，目光回到中國歷史，重點仍放在中國與外國的接觸；(六)「教學和生活」，雜談文化生活和歷史教學，就個人與歷史的關係，作了較為感性的比喻。

【C6】《中國歷史教學》，香港：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5 年。(184 頁)

本書封面題名作《香港之中國歷史教學》，是香港大專院校和中學多位教師的文章結集。內容共有八個主題：(一) 歷史教學與研究——有許振興〈歷史教學與香港的中學中國歷史教學〉、梁炳華〈香港的歷史教學〉、冼國華〈漫談學習中國歷史的意義〉三篇；(二) 課程及專題探討——有王章偉〈中國歷史科(高級補充程度)課程綱要評析〉、張志義〈漫談預科中史經濟史單元的教與學〉、鍾石昌〈「中國歷史上之相權」的教學〉、許振興〈宋代的君權與相權〉、陳佳榮〈當代中國概況教學研究與資料處理〉五篇；(三) 教案與單元設計——有譚秀於〈教學示例——韓非的法、術、勢思想〉、楊炎廷〈宋代經濟發展教案(附板書設計)〉、黃國石〈太平天國(教案)〉、區建群〈清末的革命運動(教案)〉四篇；(四) 課堂練習示例——有陳志華〈明清史課堂討論練習(六則)〉；(五) 教學方法漫談——有鍾石昌〈歷史寫作常用詞語、術語〉、余志強〈淺說中國歷史科的「小道」〉、尹達明〈中國歷史表解〉、葉國洪〈試論將漫畫應用在歷史教學上的問題〉四篇；(六) 課外閱讀指導——有何美玉〈中史科課外閱讀計劃試行草案〉、譚英達〈奇書選讀——《三國演義》〉兩篇；(七) 考察與展覽——有梁炳華〈歷史課外考察(二則)〉及〈撫今追昔——香港珍貴文物及照片展覽〉、特約記者〈歷史興趣自幼培養——訪籌備「撫今追昔展覽」的幾位同學〉三篇；(八) 比賽與遊戲——有李傑泉〈中國歷史辯論比賽〉、陳志華〈古代經濟課堂遊戲(二則)〉及雷武鐸、嚴紹仁〈大富翁——有關歷史、地理的電腦、棋類遊戲〉三篇。書末附錄〈香港中一至中七「中國歷史」課程綱要〉。

【C7】周佳榮、李金強主編《通古今之變——中國歷史教學綜論》，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 年。(161 頁)

本書收錄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有關香港歷史教學問題的文章二十一篇，大多曾在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編印的《歷史教育論壇》刊登，作者包括大學、中學教師及文化工作者，編者序言強調歷史科是教育事業中不可缺少的一環，但歷史教育在香港一向沒有受到適當的重視，此書宗旨是在世紀交替之際總結經驗和展望未來，為新世紀的歷史教育提供有益有用的參考。內容分為三類：

(一)「歷史教育的思考和改革」，包括周佳榮〈新時代歷史教育的趨向〉、陳萬雄〈中國歷史教育改革的一些思考〉、林啓彥〈二十一世紀中國歷史教育改革芻議〉、李金強〈中國歷史科課程與教學的檢討〉、黃嫣梨〈中國歷史科的教與學〉、周佳榮〈增進中國歷史科教研工作的幾個建議〉，這些文章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歷史教育提出了前瞻性的看法。

(二)「中國歷史科課程的檢討」，包括周佳榮〈中學中國歷史教學的新組合〉、葉國洪〈教學課題宜慎擇——評《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中一至中三)》〉、何美玉〈談談中國歷史科初中乙部課程之教學問題〉、周佳榮〈中國歷史科中四、中五課程析論〉、何美玉〈中四、中五中史教學一得之見〉、屈啓秋〈會考中國歷史科卷一問答題考試模式初探〉、

劉福注〈從「經濟發展」專史的設立探討高級程度會考中史科的路向〉，討論範圍涵蓋了初中、會考、預科三個階段的中國歷史科課程。

(三)「有關歷史教學的諸問題」，包括李金強〈從歷史教師本身做起——如何克服當前歷史教育的困境〉、馮少斌〈從歷史知識的性質談起〉、王雙懷〈略論中學歷史教學中的課堂設計〉、鍾寶賢〈電子媒介與歷史教學〉、文旺基〈如何善用中國歷史教科書〉、梁偉明〈談中國歷史教育中的情、事、理〉、周佳榮〈中國歷史科與公民教育〉及〈歷史教學論著介紹〉，這些文章對課本運用、課堂設計、資訊科技教育等問題均有所探究。書末有三個附錄：(一)香港現行中國歷史科課程綱要一覽表；(二)香港現行歷史科課程綱要一覽表；(三)香港學界近年舉辦的歷史教研活動。

【C8】楊秀珠主編《老師談教學：歷史教學》，香港：中華書局，2003年。(272頁)

本書收錄討論歷史教學的文章二十篇，主要是中學教師的經驗談。書首有司徒華、陸鴻基、朱鴻林的序，及楊秀珠〈主編的話〉。內容分為三輯：

(一)反思篇——包括雷武鐸〈說書——讀書——教書——教學〉、朱耀光〈生命影響生命〉、吳漢基〈圍城〉、黎淑嫻〈一位歷史系畢業生如何踏上教學之路〉、袁梅芳〈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一位中史老師的神州之旅〉、李志誠〈人情、史情、國情——情繫中國歷史〉和潘健侶〈愛的教育〉。

(二)方法篇——包括陳漢森〈我在初中中史教學上做過的嘗試〉、楊寶瓊〈中國歷史教學的回憶與反思〉、麥燕兒〈一節中史課堂的出路？——中一新課程的小思、小想、小分享〉、周志良〈資訊科技與歷史教學〉、鄭慧貞〈歷史教學的樂章〉、尹浩然〈教學分享與學科發展的關係——以世界歷史科為例〉及馮家輝〈國史教育優化之路——參與「中國歷史教育學會」工作的一些點滴〉。

(三)課程篇——包括陳淑雯〈教科書的反思——從「岳飛是否民族英雄」說起〉、蕭志駒〈誰人在說歷史？——從說書人的角度談歷史教學〉、楊碩鈞〈山重水複疑無路：參與初中綜合人文科課程統整的體會〉、區寶文〈記一次學習心得——以課程改革下的歷史教育為題〉、黃連鳳〈香港歷史教育——中學會考的課程及評估〉及梁永傑〈課程與考試：老師，這些考試考的嗎？〉。

【C9】周佳榮著《歷史絮語——教與學的文化情懷》，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年。(194頁)

本書收錄六十篇有關歷史教學和研究的文章，分為「歷史絮語」、「名人採英」、「文化訊息」和「香港情懷」四輯。著者在〈序言：從我的治學經驗和一點期望談起〉中強調，文章「盡量以深入淺出的處理方式寫成，內容都圍繞著近代東亞的變遷和演進。在新世紀開展之初，一個新東亞時代經已來臨，我們有必要認識多一點東亞的歷史，尤其

是中國與鄰邦日本的關係，香港在近代東亞史上的地位，亞太文化的特色及其展望，等等。」

【C10】梁炳華主編《兩岸四地中國歷史教學交流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2004年。(128頁)

中國歷史學會主辦的「兩岸四地中國歷史教學交流研討會」，是教育統籌局贊助的「地區教師專業交流計劃」其中一個項目。該會主席梁炳華博士（中聖書院校長）在〈序言〉中，介紹了十八區歷史古跡考察培訓計劃的概況。全書共收論文十篇：（一）陳溢晃〈從歷史古跡、氏族的特色看香港的傳統文化〉；（二）劉智鵬〈從歷史的功用看歷史教學〉；（三）丁新豹〈博物館與歷史教學〉；（四）李蘭萍〈史料及網絡等的運用與歷史教學〉；（五）周佳榮〈中學歷史教學及研究的新方法〉；（六）梁炳華〈考察香港古跡對中國歷史教學的作用和意義〉；（七）黃家樑〈談中史教學的方法〉；（八）陳子良〈澳門培正中學歷史教學及研究的新嘗試〉；（九）鄭德華〈港澳地區中國歷史教學若干問題初探〉；（十）鄭吉雄〈第六次滅種與人文多元價值的建立〉。

【C11】方駿主編《新世紀的歷史教育》，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公司，2006年。(393頁)

本書收錄香港、中國內地和台灣教育界的專家學者撰寫的論文，比較全面地探討了新世紀的歷史教育狀況。作為編者前言，方駿的〈新世紀歷史教育的理性思考〉就全書內容作扼要的介紹；二十篇論文則按照其主題，分為概論、課程、教材、教法四部份：

（一）歷史教育概論，包括陸鴻基〈歷史與歷史教育〉、于友西〈歷史教學與地球村人〉、馬衛東〈歷史課程——幫助學生連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橋樑〉及許振興〈思考 21 世紀香港的中國歷史教育〉。

（二）歷史課程的設置與改革，計有周佳榮〈歷史教育新方案——回應知識時代需求的課程和訓練〉、姬秉新〈中國 21 世紀中學歷史課程改革趨勢研究〉、趙亞夫〈中國大陸歷史課程改革走向分析〉；朱煜〈中國大陸普通高中歷史選修課問題探討〉、李稚勇〈中美社會科課程結構比較研究——兼評社會科課程世界發展趨勢〉及梁慶樂〈發展香港地區中國歷史課程先要釋解的三個結〉。

（三）歷史教材的編寫與優化，收錄馬執斌〈人教版歷史教科書對當代史學方法的吸納〉、龔奇柱〈融會新的課程理念、反映歷史學科特點——談中國歷史實驗教科書（川教版）的編寫〉、熊賢君〈歷史之樹古枝新綠——試論滬版《歷史與社會》創新嘗試〉及姚繼斌〈歷史教科書與出版社——商務印書館與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出版的關係〉。

（四）歷史教學方法的創新，包括張元〈加強歷史教學深度的一些想法〉、聶幼犁〈講求實效地開展研究性學習——中學歷史課程研究性學習的思考〉、楊朝暉〈利用網絡資源開展教學——中學歷史教學的新天地〉、趙雨樂〈舊學新思——論中國中古史的遙距教

學)、區士麒、馬建國〈資訊科技與學習動機〉及張靜〈新課程下歷史學科學生學業評價的探索〉。

(D) 1950 年以來台灣地區出版的著作

1950 年代在台灣出版的歷史教學專書，有王德昭著《怎樣教歷史》(台北：正中書局，1951 年)和孫進謀編著《怎樣教學歷史》(台北：復興書局，1956 年)兩種。1960 年代至 1980 年代的出版物似乎不多，筆者只見過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編印的《國際歷史教育研討會論文集》。

1990 年代出版的，《中國歷史與歷史教育——朱際鎰先生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 年)及張元著《談歷史，話教學》(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頗可注意；陳豐祥著《歷史教學評量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 年)及顏慶祥著《教科書政治意識型態分析——兩岸國(初)中歷史教科書比較》(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 年)，已兼顧理論與實際情況；其他幾種，多是研討會論文集。

吳翎君著《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是近年來一本具有份量的專著，對有關理論的闡釋和舉例，是比較新穎的。總的來說，台灣出版的著作，大量引用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歷史教學法，並試圖以台灣本土歷史作出說明，以配合當前的教育改革潮流，其特色是較明顯的。

【D1】王德昭編著《怎樣教歷史》，台北：正中書局，1951 年。(78 頁)

本書論述有關歷史教學的各項問題，簡明而扼要。內文共分十五章，〈前言〉以下，首先探討〈歷史的領域〉、〈歷史是研究事實的科學〉、〈歷史教學的宗旨〉；接著講解〈事實的選擇和排比〉、〈事實的敘述——兩種有害的敘述方式〉，然後分析〈歷史中的「常」和「變」〉、〈文化史的講授〉、〈年代、地名、人名〉；其餘的篇幅，依次敘述〈教科書的應用和課外作業〉、〈歷史教學和其他學科的聯繫問題〉、〈歷史教學的價值問題〉、〈中學生所需要的歷史〉、〈一個理想的中學歷史教師〉；最後是〈參考書介紹〉。

【D2】孫進謀編著《怎樣教學歷史》，台北：復興書局，1956 年。(74 頁)

這本小冊子共分七章，依次為：(一)歷史教學的意義；(二)歷史教學的目標；(三)歷史課程的演進；(四)歷史教學的環境設置；(五)歷史教學的教材和教法；(六)兒童對歷史科的學習心理；(七)歷史科的成績考查。

【D3】《國際歷史教育研討會論文集》(*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Education*)，台北：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所編印，1986 年。(350 頁)

本書書首有梁尙勇〈校長致詞〉及秦孝儀〈歷史教育與國家建設〉，中文論文有：伊

瀨仙太郎〈今後的歷史教育〉、酒井忠夫〈戰後日本的歷史教育與歷史學〉、胡昌智〈歷史教育目標的理論與實際——從實踐理性（Praktische Vernunft）的觀點論歷史教育〉、李弘祺〈傳統中國的歷史教育——以宋代為中心〉、古偉瀛〈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對歷史知識的態度——以顧炎武為中心〉、鈴木健一〈歷史教科書的變遷與現狀〉、黃秀政〈試論現階段中華民國國中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以新編國中歷史第一冊為例〉、彭小甫〈當前我國大學西洋史教育的剖析——我國各大學西洋史任課教師施教實況及其改革意見調查研究〉、張明雄〈四十年來台灣地區高中歷史教育的回顧〉、林玉體〈我國國中學生歷史意識的調查報告〉、黃俊傑〈當前我國國中教師對歷史教育的看法〉。

英文論文有：Kenneth T. Jackso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45”; Yun Sei Chul, “History as the Social Studies: Some Problems of History Teaching in Korea”; Leung Yuen Sang（梁元生）, “Teaching Confucian Ethics in Singapore: Implications for History Education”; Min Tu-ki, “National History and Foreign History in the History Teaching in East Asia”; 高橋孝助, “On ‘Community Education’ in Japan Today”。最後有〈綜合研討〉。

【D4】朱際鎰先生文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歷史與歷史教育——朱際鎰先生文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年。（8+351頁）

朱際鎰（1914—1992年）在台灣師範大學任教多年，講授「歷史教材教法」等課程，並兼任國立編譯館編審委員，編著歷史教科書多種。本書輯錄其主要著作，分為兩部份：（一）中國歷史論著，計有十種，包括《中國歷史教科書》；（二）歷史教育論著，計有〈歷史、歷史教育、歷史教育中的立場〉、〈談歷史教育〉、〈歷史、歷史教育、歷史教學〉、〈歷史教育的獨特性及其在教學上應有的認識〉、〈從歷史之流裏看道德〉、〈歷史教育之理論與實質的分析〉、〈歷史教材教法〉、〈歷史科單元教學活動設計〉八篇。附錄〈談歷史教育與歷史教師應有的修養〉等三篇，及顏尚文〈朱際鎰教授編著繫年目錄〉。書首有王仲孚〈序〉及王家儉〈朱際鎰教授傳略〉。

【D5】張哲郎主編：《歷史學系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系，1993年。（v+597頁）

本書是中國歷史學會與政治大學歷史系合辦大專院校歷史教學研討會的論文結集，上冊的主題是「史學理論與方法·西洋史」，分為六部份：（一）徐泓〈論歷史系的課程結構〉、梁庚堯〈史學導論教學報告〉、杜維運〈史學方法論的教與寫〉；（二）黃俊傑〈關於「史學方法論」教學工作的幾點思考〉、古偉瀛〈變中求常，西體中用：淺談史學量化導論的教學〉、周樑楷〈影視史學：課程的主題、內容與教材〉；（三）王芝芝〈淺論西洋斷代史教學〉、林慈淑〈世界通史教學的一點自我檢討〉、何宛倩〈西洋近古史教學的回

顧與反省)；(四)林東陽〈有關「西洋近古史」的教學心得〉、江金太〈西洋史學名著及近代思想史教學心得〉、吳圳義〈西洋現代史教學之檢討〉；(五)王英男〈法國史教學心得〉、周惠民〈德國史教學討論〉、張四德〈種族與美國史教學〉、彭小甫〈談因材施教與就地取材：以個人講授美國史的經驗為例〉；(六)陳梅卿〈我的經驗談：關於「日本社會文化史」一課之教授〉、李車華〈中外關係史相關科目教學的內容問題〉、周健〈西洋史學名著選讀教學心得〉。

下冊的主題是「中國史」，包括四部份：(一)王德毅〈中國史學史的教學心得〉、阮芝生〈史學名著的教與學：以《史記》為例〉、張元〈談史學名著選讀課程中的《資治通鑑》教學〉、雷家驥〈劉知幾及其《史通》教學的研究〉；(二)戴晉新〈中國通史教學瑣言〉、查時傑〈中國近代史教學之檢討〉、胡平生〈中國現代史教學之自我檢討〉；(三)葉達雅〈中國上古史教學之檢討〉、孫鐵剛〈野人獻曝：我的秦漢史課程大綱〉、邵台新〈魏晉南北朝史教學心得〉、王吉林〈隋唐五代史的教學與研究〉；(四)葛紹歐〈宋史教學心得報告〉、王明蓀〈遼金元史教學之淺見〉、莊吉發〈清史教材與教法〉、石萬壽〈台灣教學的商榷〉；書末附錄林正珍〈「史學導論」教學報告〉。

【D6】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編《史學專業課程教學研討會論文集》，台中：中興大學歷史學系，1994年。(iv+337頁)

本書是研討會論文的結集，主題圍繞著大學歷史系在「史學導論」、「史學方法」、「中西史學」等專業課程的教學與研究，主要包括十三篇論文，依次為：劉靜貞〈走入歷史——「史學導論」教學之省思〉，彭明輝〈動手動腳，敲開史學之門：「史學導論」教學的一點秋毫之見〉，李紀祥〈何謂歷史：「史學導論」之教學與提問〉，王健文〈關於「史學導論」教學的幾點思考〉，周健〈「古希臘史學」教學之理論與實際〉，周樑楷〈基督教與近代西方史學——西洋史學史教學中的一講〉，王吉林〈《資治通鑑》唐紀中的干支問題〉，張元〈史學名著教學與發展學生思維能力——以《資治通鑑》為例〉，陳錦忠〈淺談中國史學史課程性質與內容〉，吳昌廉〈研究報告寫作的步驟——史學方法教學問題之一〉，丘為君〈對「史學方法論」教學的若干初步反省〉，黃俊傑〈史學方法論課程的研究實習及其檢討——以「歷史研究中的客觀性」教學單元為例〉，戴晉新〈「史學方法」的課程定位與作業要求〉。

【D7】陳豐祥著《歷史教學評量的理論與實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4年。(336頁)

本書共分六章，除緒論及結論外，依次討論：(一)布魯姆(B. S. Bloom)認知教學目標在歷史教學上的應用；(二)命題原則與技巧在歷史教學評量上的應用；(三)試題分析理論與方法在歷史教學評量上的應用；(四)歷史教學評量對教學正常化的影響。作者在〈自序〉中指出，有關歷史教學評量(含理論方法與實際應用)的系統性研究，往

往為歷史學者及教師所忽略；「考試領導教學」雖然是人人深信不疑的共識，但是考試應以何種理想模式來領導歷史教學走向正常化，則一般人大多缺乏科學性的正確認識，本書就是要喚起更多歷史學者及教師重視教師評量問題並謀求改善之道。

【D8】顏慶祥著《教科書政治意識型態分析——兩岸國（初）中歷史教科書比較》，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247頁）

本書旨在探討教科書政治意識型態分析的理論，並以海峽兩岸國中（初中）的歷史教科書為對象，進行實際的分析，藉以理解兩岸教科書所欲傳達的政治信念與價值。內容分為六章：（一）緒論：從「心靈的柏林圍牆」談起；（二）政治意識型態的基本概念；（三）教科書與政治意識型態分析；（四）教科書政治意識型態分析的設計與實施；（五）兩岸國（初）中歷史教科書政治意識型態分析比較；（六）教科書政治意識型態分析和檢討與展望。書末有參考資料，及附錄台灣地區國中、大陸地區初中歷史教科書章節表。

【D9】張元著《談歷史，話教學》，台北：三民書局，1998年。（316頁）

這是一本用談話方式討論歷史教學的著作，書中以兩位高中一年級的新生對歷史課程的困惑為引子，藉著師生對話的方式，針對高中歷史教材，試圖以「史料閱讀」的方法，建構各代的歷史圖像。此書內容以中國古代歷史為主，亦談到教科書和考試問題。每一個主題都有教學建議，並且作了一些說明。全書共分十二章：（一）週末座談會；（二）從北京人談起；（三）、（四）遠古神話傳說中的歷史；（五）、（六）匈奴與漢朝之間的戰爭與和平；（七）、（八）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九）、（十）西晉的歷史圖像；（十一）教科書只是教材的一部份；（十二）考試是為了查驗教學的效果。作者張元是台灣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他在〈自序〉中呼籲「史學界的朋友們能夠多為中學的歷史教學寫一些有深度、有內容、嚴謹而又精彩的好書」，此書是他的一個嘗試，值得向讀者推薦。

【D10】張元、周樑楷主編《方法論：歷史意識與歷史教科書的分析編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1998年。（6+486頁）

本書收錄論文十八篇，中文論文有：（一）周樑楷〈歐洲和西方：高中歷史教科書研究分析的基本問題〉；（二）周惠民〈現行中學教科書有關「德國」的探討〉；（三）陳中芷〈第二次大戰後西德歷史教育的回顧（1945—1989）〉；（四）管美蓉〈台灣地區大學入學試與教學的關係〉；（五）周孟玲〈英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的中國皇朝史〉；（六）林慈淑、劉靜貞〈英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及其理念試析〉；（七）李泰永〈關於韓國的歷史課本〉；（八）張四德〈種族意識、史學研究與歷史教科書的編撰：以美國為例〉；（九）戴晉新〈歷史教科書中的人物品評——以我國高中本國歷史的四個版本為例〉；（十）徐光台〈台灣歷史教科書中科學史部份之呈現：以《世界文化史》為例〉；（十一）張元〈歷

史教科書中的因果關係)。另有英文論文七篇。

**【D11】吳翎君著《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350 頁)**

本書參照英美學者近年有關歷史教學的新趨勢，轉化於台灣地區小學高年級的台灣史教學，嘗試從歷史敘事的解釋和分析、歷史思維的引導和教學示例，並援引社會科教學方法的策略使課程活化，藉此培養學生的歷史科基本能力。作者吳翎君為政治大學歷史所博士，現任花蓮師範學院社會科教育學系教授及東華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全書共有十二章：(一)一個實驗課程的歷程與心得分享；(二)歷史意識與歷史教學的理論建構；(三)英美國家的歷史教學；(四)實驗課程之研究設計與實施；(五)至(七)是理性理解歷史的教學示例，包括「神入」歷史、歷史變遷與因果關係、歷史敘事的比較和解釋；(八)教學方法與活動；(九)課堂教學方法示例；(十)和(十一)是實驗課程運作之結果上、下；(十二)結論與建議。書末有附錄多種，包括學習手冊及歷史作業等。

【D12】王仲孚著《台灣中學歷史教育的大變動 / 歷史教育論集二編》(增訂版)，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2005 年。(335 頁)

本書是著者繼《歷史教育論集》(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 年；台北：大同資訊圖書出版社，2001 年)之後的另一論文結集，在 2003 年初版的基礎上增加了台灣新近公佈的課程綱要和相關內容。正文有論文二十二篇，包括〈台灣中學歷史教育的大變動〉、〈歷史認同與民族認同〉、〈試論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特性〉、〈試論歷史教科書的主體意識〉、〈談高中歷史的教學目標與教科書的編輯〉、〈高中歷史課程大變動與教科書的編輯〉、〈再論歷史教學中的人物評價問題〉等，以及關於《認識台灣》課程和教科書的討論等，另有多篇談及《高中歷史新課程綱要》的文章和附錄。總的來說，為台灣地區中學歷史教育變動的過程留下了時代的紀錄。

【作者簡介】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及系主任。

◆ 書刊評介 ◆

《老師談教學：歷史教學篇》讀後

張 元

楊秀珠主編的《老師談教學：歷史教學篇》是香港的中學歷史老師撰寫的文章集子，分為反思、方法、課程三部分，2003年10月由中華書局（香港）出版。如果我們想對香港的中學歷史教育有些了解，也想對香港中學歷史老師的工作與心情有些認識，這是本很值得一讀的書。況且這本書很容易讀，讀來十分有趣，一篇接著一篇，很快就讀完了，還有不少地方可說感同身受，頗能引起共鳴。

讀後第一個感想是香港同道對於歷史這門學問的摯愛令人動容，許多老師說喜歡歷史，深愛歷史，站在講台就想把這份感情傳給學生。歷史老師喜愛歷史，應該是天經地義的事，似乎不值一談。我想不然。我不是說有些歷史老師其實是不大喜歡這門自己天天講述的學問，不會的，如果他不喜歡這門學問，卻要每天講它說它，那是無法忍受的苦差事，一定會早早辭職了。我想說的是，歷史老師既然喜歡這門學問，就要多想想喜歡的理由，而且要在課堂上講出來，讓學生有所感受，就像香港的一些老師一樣。

第二個感想是香港同道的工作態度令人欽佩。我的印象中，香港老師的授課負擔極重，每週幾乎要教三十節以上。沉重的授課負擔之餘，還一心想如何把課教好，如何改進自己的教學，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不得不讓人敬佩。然而，學生的反饋也是極其明確的，老師的任何努力，學生都不會忘掉，都會銘感於心。課堂之外的關懷，也是如此。

第三個感想是他們面對相當大的教改壓力。教育行政當局對於教學似乎管得很多，許多管理的手段，像填寫各種表格，實施各種考評等等，都在進行，老師在教課之餘還要花不少精力去應付。教改的目標在於保證教學質量，提升教學水平，原屬無可厚非，然而過於形式化，甚至影響正常教學，就得不償失了。

第四個感想是「考試領導教學」的情形與我們很相似，同樣深受困擾。學生為了考試而讀書，而且是用死記硬背的方式，其結果一方面是看不起這個科目，另一方面是提升學生思維的教學難以推行。我的想法是，解決之道惟有從試題改進方面著手，把試題與能力目標緊密結合，學生的能力真正有所發展，才能在考試中得到好成績，課堂教學

方有正常化的可能。

整本書讀完，教學研究方面的呈現較少，沒有看到教學方法上的細密分析，也很少談到學生在知識上的不同反映，或許這方面不是本書的著重之處。但有幾位老師對歷史教學的觀念非常清楚，論述頗有條理，程度相當好，予人深刻的印象。

我想選兩段書中的文字，介紹給大家。首先是一篇文章中的結語：

總括而言，對解決現行中學歷史教育所有面對的困境，若是等待社會大眾改變對歷史教育的看法，倒不如歷史教育工作者採取主動，成為歷史課程改革的主導者，為中學歷史教育引入以學生為本的教學法，訓練學生高層次的思考能力，開拓學生對古今中外歷史的比較及跨文化研究的視野。相信只要學生能活用歷史知識，洞察分析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提供解決之道，並成為一個既有民族情懷而又不囿於狹隘國家觀念的好公民，現時社會大眾對歷史教育的看法便將成為「歷史」了。各位歷史教育工作者共勉之。（區寶年：〈記一次學習心得〉，頁216）

我很同意他的看法。

其次，一位老師說了一段關於歷史技能的話，錄於下：

歷史科技能取向清晰可見，初中要「向學生介紹歷史學家採用的獨特技巧，以訓練他們的思維」，歷史科針對不同學習階段的學生，教導不同「技能」：初中的歷史「技能」，是指描述、歸納、知識、推論、解釋、分辨、重組歷史的能力；高中是「訓練學生獨立搜集及處理史料之能力」。（黃連鳳：〈香港歷史教育〉，頁221）

我讀的時候嚇了一跳，初中就要教歷史學家的獨特技巧，高中要學生有獨立處理史料的能力。這樣的要求似乎太高了，尤其是對初中生而言，不大可能做得到，至少在台灣很難做到。然而在香港卻以此為目標，朝此方向努力，也是令人佩服的。

我也有不能同意的地方，不是歷史老師寫的，而是在序裡。司徒華寫道：「歷史，是最重要的愛國主義教材。」這個講法不是錯誤，而是過時了。現代學者早已不這麼講了，我們可以說：「歷史，是最重要的從理解過去而認識自我的教材。」愛國當然重要，但還是有了能力，而且對自我有所認識之後，方能具備愛國的條件，談愛國才有意義。

總之，這是一本值得大家參考的書，希望台灣的歷史老師也寫一本這樣的書，交流經驗，互相學習。

【作者簡介】張元，台灣新竹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 書刊評介 ◆

歷史學習參考書簡介

- ◆ 尹樂強、劉尚威、黃元洲編著《**高考歐洲史新編**》，香港：諾言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237頁)

本書適合高級程度會考（HKAL），內容緊扣高考課程及歷屆試題，著重分析、比較和評論，以及考試攻略技巧，並參考了學者的研究成果。

- ◆ 黃元洲編著《**高考歐洲史——歷史資料題詳解**》，香港：諾言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74頁)

本書適合高級程度會考（HKAL），提供歷屆試題的參考答案，歸納試題的主題以供學習及教學之用，並附兩次模擬試題。

- ◆ 張敏慈《**歷史，又關你事？**》，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102頁)

本書是「學生創意讀本」的一種，書首有小思的〈序〉，指出「沒有標準答案，發生討論，這本書的意義就在此。」正文分為「個人篇」和「社會篇」，共收短文三十篇，每篇列有「思前想後」若干條，旨在刺激讀者思考。附錄中國歷史王朝年代簡表及資料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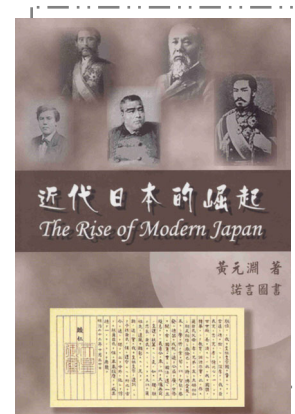
- ◆ 徐振邦著《**翻箱倒籠香港地——香港歷史文化考察指南**》，香港：阿湯圖書，2004年。(128頁)

此書是香港歷史的參考圖冊，分為四部分：第一站「香港古建築」，包括書室、古橋、古砲；第二站「香港宗教」，包括天后娘娘、門神、文武廟、三大古剎；第三站「香港歷史人物事蹟」，包括張保仔、孫中山先生、新界五大氏族、新界的抗英事蹟、中區文化之旅；

第四站「香港古石」，包括兩塊被人膜拜的石頭、界址石、石刻、奠基石。總共介紹了十六個課題，附錄〈香港的法定古蹟及認定古蹟〉。

◆ 黃元淵著《近代日本的崛起》，香港：諾言圖書有限公司，2005年。（268頁）

本書以近代日本最關鍵性的明治維新為重心，論述其前因後果。前四章探討「德川幕府的政治和社會體制」、「雙重變動的力量」、「幕府與強藩的改革」和「內憂外患」，第五至八章分析「倒幕維新」、「富國強兵」、「文明開化」和「經濟改革（1868-80）」，其後五章依次為「十年內亂（1868-77）」、「自由民權運動與明治憲法」、「經濟的再生（1881-1907）」、「帝國主義之實現」及「明治維新的審視」，附錄史料選及大事年表等。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香港學界歷史教育活動簡介

◆ 中史科教學經驗分享和課程展望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主辦「中學歷史教育講座」(一)，主題為「中史科教學經驗分享和課程展望」，2004年2月7日在香港浸會大學善衡校園鄭翼之講堂舉行，逾一百五十位中學教師出席了這次研討會。當天的大會分為五個環節：(1)開幕典禮——大會主席周佳榮博士(浸大歷史系系主任)致詞，嘉賓梁炳華博士(香港中國歷史教育學會會長)、許振隆老師(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發言；(2)專題講話——張偉國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主講「中華五千年：從電台到課室」，麥勁生博士(浸大歷史系)主講「媒體與歷史教學」；(3)課程探討——會考中史新課程的分析，由姜嘉榮老師(天主教伍華中學)及盧鑑榮老師(佛教慈航智林紀念中學)主講；(4)教學前瞻——備戰高考中史科：教學重點和考試趨向，由周佳榮博士主講；(5)經驗交流——意見、建議和展望。

◆ 中國歷史新課程教學研討會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為配合最新中學會考中史科課程的推行，於2004年3月27日假香港灣仔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教學研討會。又於5月8日假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學術交流大樓低層舉行第二次教學研討會，邀請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周佳榮博士主講，題目為「解構中國歷史高中新課程——如何在新學年做好教學準備」。

◆ 新領域會考歷史教學研討會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為配合最新中學會考歷史科課程的推行，於2004年3月20日假九龍尖沙咀馬哥孖羅香港酒店舉行教學研討會，邀請周佳榮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及梁元生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分別講述日本史及東南亞史。又於5月1日假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會議廳舉行第二次研討會，邀請陸國燊博士(中文大學出版社)講解「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合作」。

「新領域會考世界歷史」教學講座

香港教育圖書公司於 2006 年 3 月 18 日假馬可孖羅香港酒店百年廳舉行「新領域會考世界歷史」教學講座，首先由司儀朱婉兒小姐致辭，然後邀請黃偉國博士（香港教育學院）講「中國如何走向世界」、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講「重返亞洲：日本與鄰近國家的關係及轉變」，此外還有世界歷史科教材展示和介紹。

「新高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闡釋」研討會

教育統籌局課程發展組於 2006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舉辦「新高中中國歷史科的課程闡釋」研討會，內容分為三個節次：（一）課程理念、目標及設計原則，歷史研習的態度與方法；（二）課程中的必修部分；（三）課程中的選修部分。講者包括課程發展主任、課程發展議會——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中國歷史課程（高中）委員會委員、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袁梅芳老師（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劉安立老師（聖馬利亞堂中學）、楊秀珠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許振興博士（香港大學中文系）等。參加此次研討會的中學老師有三百餘人。研討會定於 7 月 4 日至 5 日舉辦第二次，有百多位中學老師參加。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 學界動態 ◆

「廿一世紀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 研討會紀要

鑑於歷史教育在現代華人社會的重要性，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與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於 2006 年中舉行大型研討會，環繞著二十一世紀兩岸三地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展開為期兩天的熱烈討論。

6 月 8 日（星期四）的會議程序在香港北角寶馬山樹仁學院舉行。開幕典禮由胡鴻烈博士（香港樹仁學院校監）致歡迎辭，周佳榮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系主任）、林啓彥教授（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會長）、鮑紹霖教授（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系主任）致開幕辭。大會有兩個主題演講：其一，是由王爾敏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講「歷史教育的重要目的與歷史教學的具體實踐」；其二，是由陳長琦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中學課改對大學歷史教學的挑戰」。這個環節由李金強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持。

同日下午舉行分組討論：第一組（a）「中國大陸的歷史教育」由林啓彥教授主持，包括：周永衛（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大陸的歷史教學類期刊及其所面臨的挑戰」；劉後濱（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淺談中國大陸歷史學本科教育與人才培養模式的轉型」；張曉輝（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暨南大學歷史系本科教學的改革」；蘇苑（暨南大學歷史學系）「廿一世紀高校歷史教育如何走出新路子」。第一組（b）「歷史教育與學識培養」由周佳榮教授主持，包括：林家有（中山大學歷史學系）「觀念的更新與教材的建設——《中國歷史》晚清民國卷教材出版的啓示」；梁碧瑩（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人物研究與歷史教學——以中美關係史的人物為中心」；黃珍德（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導讀在大學歷史教學中的運用——從葉聖陶教學方法論談起」；張慧真（香港浸會大學教育系）「從知識學習到能力培養——二十一世紀香港教育改革與歷史教育的發展」。

第二組（a）「澳門歷史教育的發展」由李金強教授主持，包括：譚志強（香港樹仁學院）「澳門的澳門歷史教育」；張偉保（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變革中的澳門歷史教育」；鄭

潤培（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澳門中學歷史課程的現況和發展」。第二組（b）「歷史文化與通識教育」由李谷城博士（珠海書院亞洲研究中心）主持，包括：葉國洪（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歷史教學與疑難為本學習——通識、考證與創意解難」；羅永生（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中國古代史研究與通識教育」；王國柱（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概論——通識教育還是國民教育？」按：葉國洪一文改在第七組發表。

第三組（a）「歷史教育與課程統整」由鮑紹霖教授主持，包括：李秀國（香港樹仁學院社會學系）「文化認同的歷史邏輯——香港中國文化教育的若干省思」；鍾石昌、趙益鎮（香港通識教育研究中心）「窮經證史」；姜嘉榮（天主教伍華中學）「一次統整的經驗——以天主教伍華中學的歷史教育為案例」；黃焯鈞（英華女學校）「香港中學通識教育科之開設對個別科目發展的影響——以世界歷史科為中心」。第三組（b）「歷史教育的區域比較」由張偉國博士（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主持，包括：左雙文（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大陸、台、港三地高中新課標教材的一點比較」；趙立彬（中山大學歷史學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廣州與香港歷史學本科教學的不同體驗」；李金強「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教學法——朱際鎰（1914—1992）生平及其著述」；余炎光（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香港和大陸『歷史教學』的異同」。

6月9日（星期五）續在九龍塘香港浸會大學舉行分組討論：第四組「歷史教育與影視戲劇」由張偉國博士主持，包括：田川（中央電視台）「影視表達歷史中的盲區」；蕭新泉、趙善軒（香港通識教育研究中心）「戲劇與中學中國歷史教育——以《歷史的審判》為例」；陳敬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東北亞研究所）「影視史學素材在歷史教學的應用」。

第五組「香港院校的歷史教學」由羅永生博士主持，包括：張偉國「香港的遙距歷史教學——以公開大學『史學方法』科為例」；趙雨樂（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新世紀的歷史教育與視像學習——以公開大學的『香港史』教學為例」；李木妙、黃仲夫（新亞研究所）「新亞的史學教育貢獻——以錢穆、嚴耕望、全漢昇、余英時等為核心」；黃淑薇（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的特藏與歷史教育的關係」。

第六組「歷史教學與課程設計」由黃文江博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主持，包括：王紅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大歷史系《亞非拉近現代史》課程開設 50 年的回顧（1956—2006）」；鮑紹霖「中國情懷與世界視野——為新一代中國大學生設計歷史課程的探索」；黃偉國（香港教育學院數社科技學系）“History and Politics: Reinterpreting Local History”。

第七組「教育改革與課程發展」由區志堅博士（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主持，包括：劉聖宜（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學科教育碩士的培養與中學歷史教學改革之趨勢」；梁炳華（中聖書院）「香港中學中國歷史教育的危機與前瞻」；周佳榮「香港學制改革進程與歷史教育前瞻」。

第八組「文物考察與歷史教學」由蘇維初教授（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主持，包括：吳志華（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文化遺產與歷史教育」；區志堅「大學與中學協作計劃——以志蓮淨苑專題研習為例」；周子峰（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工具書與中國近代史的教與學」；陳偉強（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Reinventing Hong Kong History: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資料室）



The poster is titled "廿一世紀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 (History Education for 21st Century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is organiz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at Shue Yan College. It details two days of events: Day 1 on June 8th at Shue Yan College and Day 2 on June 9th at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e poster includes a list of speakers, topics for group discussions, and a list of papers to be presented.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ociety
of Hong Kong

香港樹仁學院歷史系
Department of History
Shue Yan College

* 聯合主辦 *

“廿一世紀華人社會的歷史教育”研討會
History Education for 21st Century Chinese Communities

第一日程序

日期：2006年6月8日（星期四）
地點：香港樹仁學院（香港北角寶馬山）

開幕典禮 上午（9:15 – 10:00 a.m.）

主題演講 上午（10:30 a.m. – 12:00 p.m.）
王爾敏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歷史教育的歷史目的與歷史教學的具體實踐
陳長壽教授（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中學課程對大學歷史教學的挑戰

分組討論 下午（13:30 p.m. – 18:30 p.m.）
(1) 中國大陸的歷史教育；(2) 歷史教學與研究探索；(3) 澳門歷史教育的發展；
(4) 歷史文化與通識教育；(5) 歷史教育與課程統整；(6) 歷史教育的區域比較
～發表論文共22篇～

第二日程序

日期：2006年6月9日（星期五）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九龍窩打老道）

分組討論 上午（9:20 a.m. – 12:30 p.m.）
下午（14:00 p.m. – 18:30 p.m.）
(1) 歷史教育與影視戲劇；(2) 香港院校的歷史教學；
(3) 歷史教學與課程設計；(4) 教育改革與課程發展；
(5) 文物考察與歷史教學
～發表論文共17篇～

～歡迎參加～